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十七期 1994年7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17, July 1994.

帝國之眼¹： 「次」帝國與國族—國家的文化想像*

陳光興

The Imperialist Eye:
The Cultural Imaginary of a Sub-Empire
and a Nation-State

by
Kuan-Hsing Chen

關鍵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國族主義、第三世界、國族、國家、文化研究
Key Words: Colonialism,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Third World, Nation-State, Cultural Studies.

*本文獻給久為病魔纏身而依然堅強的好友吳正恆。
寫作過程中〈台社〉、〈島邊〉及清大幫的朋友們曾經提供資料或是修改意見。多謝丁乃非、江士林、丘延亮、于治中、李丁讚、陳傳興、吳泉源、傅大為、姚立群、趙剛、何春莊、吳永毅、楊明敏、李尚仁、卡維波、馮建三、呂正惠、謝國雄、錢新祖、陳清橋、鄭鴻生、鄭村棋、毓秀、林宗浩、Herbert Schiller、Naoki Sakai 等人與我的對話，特別是對本文提供的意見或質疑，這篇文章不屬於我而是與她／他們對話的產物。

收稿日期：1994年4月26日；通過日期：1994年6月23日

Received: April 26, 1994; in revised form: June 23, 1994



摘 要

帝國的建立往往得靠著文化論述的支撐與呼應。論述的作用在於介入國族文化空間，徵召國族主義主體進入接合作用所建構的召喚位置，臣服於國家機器／資本／男性／種族／族群沙文主義的霸權方案。反霸權的論述性介入，由第三世界文化研究問題意識出發，企圖解讀、拆穿〈人間副刊〉南向論述中以日帝文化想像的翻版與台灣次帝國主義形成之間的共謀關係。處理的問題是南進論述的意識形態構造是什麼？作為一種文化想像，它的來源是什麼？它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國族主義、以及國家機器主義在意識形態結構層次上如何聯結？

我的解釋核心論點是：南進的文化性論述是權力集團所主導國族營造、國家機器再打造與帝國形造三位一體霸權方案中的一個環結。這個霸權方案以台灣國族主義為基地的統合性原則，企圖收編集權制瓦解後的社會力，將「中共」建構成假想敵，來掩蓋階級、性別、種族矛盾，「統一」台灣，鑲入以美帝為霸主的新殖民全球資本主義結構。

台灣是否可能成為帝國不是本文所要處理的問題，關注焦點在於南進論述所建構的文化想像投射出來的帝國慾望，層次是放在文化想像的意識形態的建構，及如何將國族—國家與次帝國接合起來。

最後，我點出台灣國族主義已經無棋可走，必需重新思考國族主義的問題，「向下」走回社會中已經浮現的敵意與矛盾，放棄自戀的種族中心主義，認清台灣所處的第三世界位置，與國際上被壓抑的社會主體群相互聯結，對抗以資本／國家機器為核心的新帝國主義。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an empire always requires the active support of cultural discourses. The effects of such discourses lie in cutting into the space of national culture, recruiting the nationalist subjects into the interpellated subject-position constructed by the articulating agent, and hence subjecting popular consent to the hegemonic project of a state apparatus/capital/male/racial/ethnic chauvinism. The counter-hegemonic discursive intervention begins with the problematic of a Third World cultural studies, attempting to de-poison or expose the complicity between the formation of a Taiwanese subimperialism and direct copy from Japanese imperialist cultural imaginary of the colonialist past as is revealed, in my analysis, in the "marching southward" discourse represented in the special issue of the "Human World" supplement, of the *China Times*. The key questions to be tackled are: what are the ideological structures of the "marching southward" discourse? As a cultural imaginary, where are its resources coming from? How, in its discursive practices, are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statism articulated on an ideological level?

At the heart of my argument is: the cultural discourse of "marching southward" has to be explained and situated within the nodal point of power bloc's

hegemonic project of a trinity complex: nation-building, state-(re)making and empire-forming. This hegemonic project works on the ground of a Taiwanese nationalism, as its unifying principle, attempting to suck in the social forces emitted after the collapse of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constructing China (Chinese Communism) as his imaginary and real other, covering up the contradictions of gender/sexuality, class, and race and ethnicity, internally unifying "Taiwan" and externally inserting it into the neocolonial structure of global capitalism led by the American Empire.

Finally, I point out that there is no way out for the Taiwanese nationalism, which has been incorporated and coopted by the state machine, and hence has to rethink its political and theoretical problems. The alternative strategy is to move "downward" into the social field of forces in which antagonism and contradiction have already been on the move. It has to give up its narcissistic ethnocentrism, understand Taiwan's position "within" the Third World, and has to connect itself to the oppressed subject groups across borders so as to counter the neo-imperialist domination, mainly composed of the multinational capital and the super state apparatus.



我們活在不同的本土，不同的國度裡。

——台灣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

我是國際主義者，因為我是女性主義者。

——Meaghan Morris

[非洲] 國族—國家的建造是反人民的。

——Manthia Diawara

我努力尋找，
體內血液的源頭。
有人說我來自馬來亞群島，
中國西南的邊境……
父母卻傳說道：
我們是太陽的孩子，
百步蛇的蛋，
大地蘊育的種族……
終於得不到確切的答案。
但追溯卻使我肯定，
了解美麗島真正的主人，
以及一頁一頁殘破的歷史。

——〈燃燒〉，莫那能（1989）

1. 「第三世界」文化研究的問題意識²

過去這幾年，我一直被一個問題所困擾：在第三世界像台灣這樣的地方從事「文化研究」到底是什麼意思？

一九八九年受了多年英美文化研究訓練之後，我回到台灣，親身經歷了台灣社會變動最快的幾年。批判性文化研究的訓練驅使我介入到變動的過程之中。當然，「本土化」的氣氛讓我不斷思索學術上自我

1. 本文完稿後發現英文著作中有以 *Imperial Eyes* 為題的專書存在，參見 Pratt (1992)。

2. 有關這個部份更為完整的討論請參見 Chen (forthcoming)。

去殖民化的必要性；但是也更讓我認識到關閉性的本土化走向會是個死胡同。在在地 (local) 現實批判理論及自身歷史經驗不斷的擺盪中，我一直在摸索一個可以站得住腳的立場／位置。沒有自己可以自我辯解的立場，研究根本無法展開。相較於以往在國外時期所發表的理論文字，「人民民主」論述與「新國際在地主義」都是我在摸索過程中的嘗試³。

一九九三年到菲律賓參加「亞洲區域性新另類學術交流」(ARENA) 所主辦的「改變中的全球性現實與亞洲人民的未來」討論會，為我帶來很大的撞擊⁴。第一次和全都是來自亞洲的批判性學者聚在一起，第一次開始積極地認識到亞洲各地的政經文化狀況，第一次發現自己的英文是多麼的「美國腔」，第一次身處與台灣相似又極不相同的菲律賓社會，當然也第一次聽到當地人以帝國主義來稱呼台灣入侵的資本，也再次加深「第三世界」這個政治／理論概念的重要性。我想我逐漸找到了位置，逐漸看到台灣本土文化研究的盲點，也發現到「西方」文化研究的侷限。或許在在地、第三世界、全球資本主義文化的辯證中，一條新的路子可以被走出來。

1.1 文化研究的「國際化」危機及其盲點

文化研究這個批判性的學術領域正面臨著「國際化」的走向，過去各地的研究都以在地的關切為主導，而現在跨國界的對話正在形成。目前的大問題在於，在認識論層次上，「國族—國家」(nation-state) 幾乎成為所有在地分析的預設疆界、脈絡；於是有英、美、加、澳……文化研究，不斷在複製它所攻擊的對象，也不斷地再生產既有資本主義體系裡的權力關係。以最近出版的兩本五百頁至八百頁均以「文化研究」為題的大書為例，第三世界地區的研究完全不在其中，

3. 參見陳光興(1992: 167—183; 192—196, 238—248), Chen(1992及 forthcoming)。

4. ARENA 全名為 Asian Regional Exchanges for New Alternative, 成立於1982年, 為跨國的批判性學術組織。

作者也大都集中在歐美地區⁵。雖然如此，對話意願確實存在，像《立場：東亞文化批判》的主編就主動到台灣、香港、韓國等地與學術團體建立關係，希望能夠打開對話的管道⁶。

在已經形成的對話中，最為激烈的辯論是印度學者阿漢馬（Aijaz Ahmad, 1992）所出版的《在理論中：階級、國族與文學》，從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觀點，批評詹明信（Fred Jameson）及薩依德（Edward Said）的理論。《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則以整期〈在理論中辯論〉專號來形成辯論空間。不幸的是，幾乎所有的回應文章都是一面倒，攻擊阿漢馬的立場，並沒有能形成正面的對話及挑戰。

其他的新興學術期刊，如《第三正文》（*Third Text*）、《新形構》（*New Formation*）、《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理論、文化與社會》（*Theory, Culture, Society*）、《變動》（*Transition*）、《社會正文》（*Social Text*），以及即將創刊的《國際傳播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都有心地在創造對話的空間。

這種「國際化」的現象，其實並不只是來自文化研究者交互串連的結果。霍爾（Stuart Hall）認為這種現象反映了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culture*）的壓力，是後冷戰時期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結果（Hall, 1995），幾乎沒有任何地方在地文化的運轉可以被全然解釋，而不需要與全球化層次相關照、辯證。因此，全球化也就成為重要研究議題⁷。然而，這個議題固然能形成國際性文化研究對話的焦點，第一世界批判性論述因其所處的學院及地緣政治（*geo-political*）位置，却也隱藏了相當大的盲點。以最近風起雲湧的「後殖民論述」為例⁸，它雖然成功地接收、轉化了後現代論爭的能量，並且將其政治化，但是在香港、澳門等地依然處於殖民狀態之中，第三世界地區仍然被擺

5. 請參見 During (1993) 及 Grossberg et al (1992)。

6. Position: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s 的主編是 Tani Barlow。

7. 有關全球化議題的討論，參見 Gómez-Peña(1992—3), Falk(1992), Robins(1991), Morloy(1995)。

置在資本主義新殖民結構中的條件下，原住民、工人、女性、同性戀仍然被強勢族群，資本家、男性沙文父權結構及異性戀體制所殖民，宣告後殖民文化結構的形成，確實是肇因於「後殖民論述」所處的全球結構強勢位置。效果上它不僅模糊了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中新殖民結構的面貌，為強勢原先殖民主體脫罪，也有可能成為全球霸權秩序重組的先頭理論部隊。其實隱藏在「後殖民」背後的仍然是「國族—國家」的幽靈，以政治主權（political sovereignty）的轉移與取得，作為殖民與後殖民的分水嶺；經濟、文化的持續殖民、政治上的新殖民似乎可以一筆勾消。

全球化議題的另一隱憂則是它可能掩蓋了其中權力關係的問題。雖然霍爾在論及全球化議題中，一再強調權力不均衡的問題一定要不斷地被思索⁹，而這種去權力化、去政治化的傾向確實已出現。湯姆林森（Tomlinson, 1991），在《文化帝國主義》一書的結論章名〈從帝國主義到全球化〉表現出將批判性概念（帝國主義）以中立化（neutralizing）字眼（全球化）來取代的脫罪策略¹⁰。對於他來說，帝國主義是動機性及目的性極強的企劃案，企圖將一種體制強行推銷至世界各地，相對而言，全球化沒有明顯的動機，現代性（modernity）作為一種人類的文化宿命，所造成的結果是全球各地區相互依賴，相互聯結，所面對的問題是全人類的問題，要共同面對。在他的論證中，全球化過程似乎不再牽涉結構性的資源、權力分配不均，壓迫與宰制、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資本／勞動、國家機器／社會主體之間所存在的差異性、權力關係都被全球化所劃平。這種論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湯

8.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 Homi Bhabha，他近年的文章最近收在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一書中。其他重要文獻參考 Spivak (1990), *Social Text* (1992)。另外印度的 *Subaltern Studies* 也常被視為後殖民論述，見 (Guha and Spivak, 1988)。對於後殖民論述的批判，參見 Miyoshi (1993), Dirlik (1994)。

9. Hall (1991, 1992, 1995)。

10. 中文版已由時報出版，馮建三譯。更為細緻的批判，參考筆者在該書中文版的序言〈解毒《文化帝國主義》〉。

姆林森所處位置的盲點。

1.2 第三世界與新殖民主義

社會主義第二世界的快速解體，第三世界的內部殖民，全球性政經權力結構的轉變，使得「三個世界」的理論必須被挑戰、修正¹¹，但是快速的抹除帝國主義的歷史沈澱，確實有脫罪之嫌。其實帝國主義是否已經被全然置換，也是值得辯論的問題。

當然，相較於帝國主義早先的表現形式，新殖民主義在一、二次戰後的去殖民運動後，特別是七〇、八〇年代以降，有了相當大的變化。領土的取得、武力的鎮壓、政權的直接接管……已經由「霸權」(hegemony) 的操作邏輯所取代。多國／跨國公司¹²、全球資本主義、超大型國家機器組織，是新帝國主義的表現形式；透過強勢資本、軍事實力、國際政治的主導地位為後盾，新形成的政經依賴，以及層級化的新國際分工，是新殖民結構稱得以自我再生產的主要機制。而帝國主義的構成關鍵性條件以及所造成的結構性效果却沒有改變：1. 核心都會地帶大型企業的壟斷結構持續存在；2. 經濟中心的力量不斷擴張，對於資源及市場控制的企圖心更為旺盛；3. 服務於強勢地區的國際分工體系依然繼續；4. 工業強權國家對於在世界各地市場輸出及投資的競爭日益強烈；5. 對於勞動力的剝削持續加深；6. 總體貧富差距的加大；7. 被殖民地地區生態環境的加速惡化¹³……。就如許勒 (H. Schiller, 1991) 所言，後帝國主義尙未來臨；三好將夫 (Masao Miyoshi, 1993 : 728) 更進一步說，在跨國公司所展現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形式裡，殖民主義較以往更為生龍活虎。

即使是三好將夫這種激進的立場也投射出他所處的地緣政治位置

11. 參見 Pletsch (1981), Ahmad (1992 : 287—318)。

12. 有關跨國資本的研究，請見 Clairmonte (1989)。

13. 前四點參考 Magdoff (1978 : 140, 242—4)。

上的盲點。對他來說，從殖民主義到跨國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國族—國家機器 (nation-state) 的角色相對式微，取而代之的歷史作用者是多國—跨國公司。但是，如果身處第三世界，那麼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國族—國家機器，乃至於國族主義 (nationalism) 的力量不降反升 (南韓、台灣、新加坡、菲律賓、印度、錫蘭等都是例證)¹⁴；我們必須承認跨國資本主義的強大力量，但是也要認清國族——國家機器的角色在這個過程中也在轉變，並不必然在衰亡之中。超大型國家機器 (歐體、北美貿易區、東協……) 所展現的就是透過區域中強權國家機器的合縱連橫，進行市場地盤上的分劃、切割，對國際資本主義體系「再結構」、「再分工」。在這個層次上，我們不但要對國家機器的強勢／弱勢、中心／邊陲做細緻的區分，才能認清這些組織中主導力量之所在；同時，我們也不能美化第三世界國家機器，而必須認清它們的階級性質，不以國家機器—國族為認同對象。

第三世界的革命理論家法農 (Frantz Fanon, 1961) 在阿爾及利亞獨立建國前發表的重要著作《大地之不仁》一書中，就已經分析到，在去殖民的反帝過程中，如果不能將國族主義的動力轉化成具有解放內涵的社會及政治意識，一旦共同敵人殖民主消失後，最具有資源的國族資產階級 (national bourgeoisie) 就會取得新國家營造的主導位置；在搶奪國家機器的過程裡，對外與殖民祖國緊密結合，使殖民地變成新殖民地 (neo-colony)，對內則進行「內部殖民」¹⁵，壓制勞工階級、農民、原住民、女性，同性戀，甚至廉價地引爆原有族群間的文化差異，製造族群衝突，以達成資產階級內部奪權之目的，却造成長期的族群大火併。

14. 參見 David and Kadirgamar (1989) 所編一書中，亞洲左翼學者對亞洲地區的分析。

15. 這種從原先的殖民地變成新殖民地最為清楚的例證是非洲大陸，新的國族—國家的建立幾乎與當初列強瓜分地盤的疆域版圖相一致。另參見 Hechter (1977) 對內部殖民 (internal Colonialism) 的討論。嚴格地說，「內部」所指的是地理位置上國族—國家的內部，而從「破國家」的觀點來看，其實無所謂「內」「外」之分，見4.3節。

1.3 重訪法農的殖民→去殖民→新殖民命題

法農的分析裡，隱約地提出了面對第三世界共同結構性經驗的理論模型：殖民→去殖民→新殖民／再殖民／內部殖民，納入新殖民資本主義的運動過程。循著這條歷史的軸線，向前推進，一方面接合到全球資本主義的新殖民層級結構，一方面聯結到特定地區的獨有的歷史過去及當下的歷史環境 (historical conditions)，或許一個較為貼切於第三世界所處 (時間／空間) 的歷史—地理唯物論 (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¹⁶，可以用來回答全球—在地辯證過程中各個層次所浮現的問題。或許從這樣的架構中，上述批判性論述的盲點可以被閃過，國際性文化研究對於帝國殖民主義所形塑在地文化，及在地被殖民意識所形成的對抗性文化的研究路線可以被開展出來¹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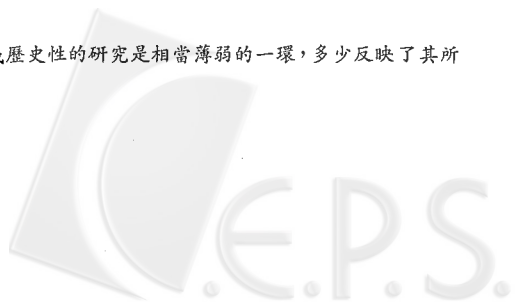
這條研究路線的提出不在製造第三世界中心主義／沙文主義，也不排除第一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如何能夠形成交互對話、交互接合，能夠 (至少在學術知識生產體制中) 形成反霸權的異類 (alternative) 結盟關係是要透過集體的互動來逐漸形成。

在這樣地脈絡下 (不複製既有權力體制)，第三世界文化研究的批判性立場不僅在於抨擊「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同時也必須跨出國族主義的限制，突顯出「第三世界」內部的多重宰制結構及關係、第三世界的「內部」層級式分化、以及新興的第三世界「次」帝國主義。

以下的分析也正是這條研究路線的起點，一個面向的嘗試，這將是我長期努力的目標，特別對歷史性殖民精神分析的構造。

16. 參見 Soja (1989: 10—75)

17. 文化研究對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歷史性的研究是相當薄弱的一環，多少反映了其所處的優勢地緣位置。



2. 「南、西、東進」：台灣次帝國的形成¹⁸

由國家機器主導、反對黨背書的「南進」政策，從1994年初以來受到「公共領域」熱烈回響，御用學者、政客、資本家紛紛出籠，從所謂「全方位」的角度來替南進宣導。反對的聲音不是沒有，零散的噪音，分別從南方諸國所提供條件不夠優惠、政局不夠穩定、基礎設施落後、行政效率太低、地價上漲、工資逐年上升來「反省」南進政策¹⁹（注意：跨國資本似乎也用同樣的字眼來描繪台灣的「投資環境」）。正反雙方其實都已經被「南進」敘事架構所制約，根本不容許更為後設的批判性思考擠入對話場域。

其實「南進」、「西進」與「東進」所投射的共通慾望，與十七、八世紀以降帝國主義的擴張主義（expansionism）邏輯是一致的。簡單的來說：台灣帝國正在形成²⁰。

2.1 次帝國的界定及具體實踐

更準確的來說，台灣「次」帝國的意識形態正在形成：在新殖民帝國主義的結構中，台灣的政經、文化結構受制於美國及日本；在這種結構中企圖向外擴張的對象是政治經濟體質更為弱勢的地區而非強勢資本主義地區。因此，我用「次帝國」指稱帝國主義下的依賴性次級帝國²¹。這裡所謂的新殖民帝國主義所指的是早先形式的資本主義結構性宰制關係，不再以軍事力量取得他國領土，直接控制該國政權，以奪取經濟利益，而是以政治經濟優勢間接介入他國，影響政策走

18. 「次」帝國是一個新興現象，韓國左翼學者以「亞」帝國來描繪韓國的現況，此點由陳映真在6月11日文化批判研討會時所指出。在修改過程中，本文接受評審者的建議去除「主義」二字，因為帝國主義在學理上一直爭辯不休易造成混淆。

19. 反對意見如徐宗懋（1994），黃毓麟（1994）。

20. 有關帝國主義的理論參見 Lenin(1939), Magdoff(1978), Hobson(1965), Luxemburg(1976)。

21. 至於美國是不是帝國，在怎麼樣的意義下是帝國，不是我要爭論的焦點，請參照美籍著名學者許勒的名著〈大眾傳播與美國帝國〉，(Schiller, 1992)。

向及操控市場（如美國三〇一條款）。在第三世界的歷史實踐中，諸多原先的殖民地在獨立建國後都再次成為原先殖民主的次殖民地，原因包括經濟、政治及文化的依賴。在全球資本主義所形成的層級化構造，稱之為新殖民帝國主義。

台灣次帝國形成的具體表現到底在什麼地方？1. 中、小資本的西「進」、南（向），國家機器政策的南「進」（向），都是向外擴張的指標。2. 菲律賓蘇比克灣是「台灣第六個加工出口區」（經濟部長用語²²），在越南河內企圖建立的「台商工業區」，以及印尼巴潭島的「台灣開發案」，這些不僅顯示資本／國家機器的向外擴張，甚至已經有了古典帝國主義建立基地、對海外「領土」控制的態勢。3. 對於大陸勞動力的「剝削」更是不在話下，關廠、資金外移就是要剝削比台灣更為廉價的勞工；以金錢優勢對於女性的壓迫也層出不窮²³，甚至發生毆打女工的現象；勞動環境的惡劣，工廠著火燒死工人（泰國的台商玩具工廠及大陸製鞋廠），對於工人的苛待（軍事化管理、懲罰）也曾經引發菲律賓女工罷工事件。4. 經濟上，台灣1989年在馬來西亞的投資僅次於日本佔24.7%，在泰國也僅次於日本佔10%左右（1988），1990年在福建省投資佔外資 $\frac{1}{3}$ ，同年在廣東省投資僅次於日本佔第二位（Tan, 1993）。台灣資本的向外擴張早在1980年代末期已在東南亞諸國大量形成，在泰國及馬來亞都僅次於日本佔外資第二位（Tan, 1993: 63, 65）。5. 在政治層次上，企圖透過進口外籍勞工政策（如從泰國）的伸縮，直接影響他國經貿外交政策，表現出「依賴」性新殖民邏輯。1994年4月印尼工人罷工反華商剝削，中、台政府積極介入施壓當地政府鎮壓工運。6. 文化上，音樂、影藝、出版工業全面搶灘登陸，鄧麗君、瓊瑤、趙傳早已深入「敵後」，把台灣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滲入社會主義的日常生活，潛在的效果是在改變意識形態的集體性構造。

22. 參見《中國時報》（1994），二月廿一日頭版及二版。

23. 參見吳永毅（1994）對里巷工作室製作《台胞》記錄片的批評。

台灣次帝國的建立能否成功？資本擴張的結構性流向到底該往那裡走？資本是不是一定要向外擴張？這些都不是我要論辯的問題，而是國家機器／資本家的關切。不過要點明的是，帝國主義擴張心態可能造成的效果，不僅是在剝削他國勞工，它對本地勞工也相當不利：關廠、資金外移造成勞工失業。

台灣歷經荷帝、明清王朝對原住民的殖民，在半世紀前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去殖民過程剛剛開始，就快速地被國民黨政權再殖民，受到美國以全球戰略考量而提供軍援、經援的「誘惑」，推向美國帝國主義新殖民結構的懷抱中；六、七〇年代，就是憑藉著壓榨高強度的勞動力，才能躋入資本主義分工體系，不僅造就了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也造就了今天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無奈資本無祖國，他們今天都得關廠，遠渡重洋，不但得遠離家人，也得拋下當初養肥了他們的勞動階級。土地／資本／國家機器的三邊聯合，正為台灣帝國主義的形成赴湯蹈火²⁴。從這裡可以看到，「南進」所顯現的是台灣的資本積累已經在短短的五十年間，快速的由殖民地躍昇至準帝國主義的結構性位置，在全球性資本主義地形圖中不再邊陲。雖然它仍然受到大型帝國在政經連鎖上的牽制，但是已經加入帝國競爭的行列，「向下」投資以搶取市場、資源、勞動力。這是否意味著1955年印尼「班東（Bandung）會議」以來所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²⁵，在四十年間全球資本主義擴大再結構的過程中，原來處於第三世界位置但是現在已經能夠向外擴張的地區（四小龍，NICs），已經取代了原有的第二世界的層級位置，重劃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地理圖形？還是，我們必須對第三世界的「內部」差異做更為細緻的區分？²⁶

24. 有關台灣資本與國家機器的結合，參見王振寰（1993）。

25. 參見 Ahmad 的 “Three Worlds Theory”（1992：287—318）。

26. 近期有關 NICs 及下一代 NICs 的討論，參見 Tan（1993）。



2.2 文化與帝國主義：薩伊德

這裡，我要強調，台灣次帝國的成敗不是我的關切所在，重點是：在「南進論述」中可以看到帝國意識，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和帝國慾望相當「坦誠」地呈現，這也正是本文分析的層次與焦點。當然，帝國的形成本在歷史上從來就不僅僅只是純然在政治、經濟、軍事的場域操作，文化論述扮演著積極的接合作用，替權力集團的帝國形造提供「理論」基礎。問題是：理論基礎的資源 (sources) 是什麼？

薩依德 (Edward Said)，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發言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國際左翼頗富盛名的文化理論家，繼《西方中心主義》(Orientalism, 1978)²⁷之後，在一九九三年的新書《文化與帝國主義》中，再次對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塑造進行解剖。薩氏分析的主軸雖然擺在西方過去文學傳統中的經典——康萊德 (Conrad)，奧斯登 (Austen)，卡謬 (Camus) 等——他所關懷的問題意識却是有強烈的當下及前瞻性：龐大的殖民結構雖然在二次戰後隨著帝國 (empire) 時代的結束而解體，但是古典或是高峰時期的帝國主義依然對現在持續發揮著文化上的影響 (Said, 1993:7)，帝國影響文化各個層次的巨大陰影依然揮之不去，更無法一筆勾消。然而，過去批判性論述對於帝國主義的辯論大都集中在政治及經濟的問題上，文化在現代帝國主義經驗所扮演的角色却沒有受到相對的重視。對薩氏來說，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絕非只是簡單的資本積累與資源及領土的奪取，而必然有強大的意識形態結構的支撐與驅動 (Said, 1993:9)，才能整合內部的差異，一致對外。更進一步來說，在帝國主義形成、擴張的過程裡，它不僅將自我的認知投射在殖民地，來界定被殖者的文化，事實上它也透過與殖民地不斷地變動關係來自我界定、自我肯定；帝國主體性的建構依靠著它與殖民地之間的權力關係來進

27. Orientalism 許多人譯成「東方主義」其實有瑕疵；其準確的意義是以西方中心的觀點看「東方」所暗涵的歧視。

行。薩氏的分析相當具有說服力地說明了文化論述，實踐與政治——可能是有意識的，也可能是無意識的——在效果上攜手製造了宰制系統，這種宰制體系延伸至文化想像的空間，形塑了宰制者與被宰制者的思考範疇，不僅肯定了帝國擴張的權利，也使得其它的可能性無從想像。

薩氏厚重的分析當然不可能在這裡全然重覆，但是上面所提及《文化與帝國主義》的幾點洞見，對下面的分析提供一些切入問題的方向。簡化的來說，薩氏的論述中，浮現了幾個詮釋的方向：1. 帝國主義的形成必須有文化論述／意識形態的支撐；2. 帝國主體得依靠它與被殖民者的關係位置才能自我界定，找到認同；3. 帝國主義所建構的文化想像往往形塑著被殖民者的視野。這幾點命題不是我的分析架構，而是我閱讀過程中經常回到的參考點。在分析與這些命題的辯證，來回答2.4節提出的問題。

2.3 國族主義與民族主義有啥差別：翻譯的政治

薩氏對西方帝國主義及文化論述共謀的分析，當然不能直接用來面對第三世界的新現象，這裡的核心概念是「國族—國家」(nation-state)，「國族主義」(nationalism) 將是本文詮釋循環的中點站。

Nation-state 在台灣的主流論述中，或許是繼承了孫中山「中華民族主義」的傳統，被譯為「民族國家」，近來亦有人譯成「國民國家」，而從歷史的轉折來看，它的意涵是「國族—國家機器」。諸多的歷史研究都已經證實，國族是國家機器的建構；國家機器經由挪用、轉化國族主義的論述及情緒，創造了國族。因此，在歷史實踐上，國族與國家機器密不可分，新的國族打造基本上是國家機器主義 (statism) 的重要環結²⁸。

在另一種譯法中，如黃美英 (1993)，即將 nationalism 譯為「獨

28. 參見 Hobsbaum (1990)，及丘亞飛 (1993)。

立建國運動」，標識出國族主義與獨立建國的目標是無法切割的。

因此，「民族—國家」是現代化意識形態下的產物，而「國族—國家」旨在揭穿其建構 nation 時與 state 的不可分割性。

在本文以後的書寫中，如果使用「民族主義」即表示是對話對象的用語，「國族主義」、「國族—國家」則是作者的用語。

2.4 「南向專輯」的定位及問題的提出

以上我把「南進」定位在帝國意識形態的投射，下面我要逐漸進入文化政治分析的層次。首先我要選擇分析的對象。1994年初至今三個月來，大大小小散佈四處的圖像、畫面、敘事、論證、意見、投書……共同編織出交叉重疊的「南進論述」，形成一種南進的社會氣氛及風潮。其中最具整體性，最有影響力的「文化論述」應該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從三月二日至三月四日，連三天兩個半全版製作的「來自南方的黑潮：南向專輯」。基於〈人間〉所佔據的重要文化戰略位置（是台灣主流報紙副刊的龍頭老大，「台北文化圈」主流文化評論的發言台），我將比較細緻來解讀其中主要的意識形態效果，而非論者的書寫動機。我的分析將不受限於文章 (text) 的「內在性」；〈南向專輯〉的力量正在於它緊密的介入於現實的歷史—社會流動空間，召喚著「南向主體」。因此，在方法論的層次上，我不把〈南向專輯〉視為具有關閉性、結束的文化商品，而是企圖透過分析層層撥開〈南向論述〉中所接合的多重意識形態結構。在論述分析的知識論層次，我並不預設在社會空間中，南向論述必然可以毫無阻力而又成功地徵召社會主體；但是也不能忽視其潛在地可能性。相對而言，本文可被視為與其「競爭」的反霸權論述²⁹。當然，我的閱讀不是唯一的可能性，工人、女性主義者、原住民、同性戀都可能讀出我沒能觸及的要害。至於有

29. 或許有論者會質疑說我的分析有些「矯枉過正」，書寫者只是「一頭熱」而沒有仔細思考就下筆如珠；但是正因為一頭熱才更可能不加掩蓋而投射出直接的精神分析層次上的慾望。

沒有抓到七寸，就不是我的慾望所能夠主導的了。

我要提出的問題是：「南進論述」的文化政治、意識形態意涵到底是什麼？「南進論述」是怎麼操作的？它的論述形式、內容及方向是什麼？它展現了什麼樣的意識形態結構？作為一種文化想像，它的來源是什麼？我深層的理论關懷是：透過「南進論述」的分析，是否可以看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國族主義以及國家機器主義在意識形態層次的聯結？³⁰再次強調，本文的核心分析點擺在文化想像層次，透過「南進論述」的分析，來展現國族—國家與次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勾連。

3. 「帝國之眼」：解讀〈南向專輯〉

〈人間副刊〉的〈南向專輯〉出現在李登輝過年期間南行東南亞諸國之後，與政治情勢之間有明顯的現實意義及主從關係。整個專輯由五位「學者專家」操刀：楊長鎮、劉克襄、吳密察、楊照及楊波。這幾個以往以「自由派」或是「本土左派」自居的人士（大部份在以往都在文化、學術圈內被視為「反對」派），突然之間快速地向體制靠攏，為國家機器主導、在野黨背書的南向政策找尋歷史、文化的理論基礎，對長期參予在「台北文化圈」的異議份子而言，確實帶來了多多少少的困惑。這個文化現象到底要如何理解？難道這意味著新「歷史」階段的來臨？原來的反對人士不再反對，而積極加入「新政治秩序」？

這五篇文章刊出的時間順序是：楊長鎮的〈凝視低緯度：台灣與「東南亞運動」〉及劉克襄的〈一條消失的線〉於一九九四年三月二日出現；吳密察的〈重新認識台灣的位置〉及楊波的〈神祕的華人〉出現於三月三日；楊照的〈從中國的邊陲到南洋的中心：一段被忽略的歷史〉則橫跨三月二至四日三天。

30. 本文所指意識形態的理論傳統基本上承習 Gramsci, Althusser 及 Hall，視意識形態為「再現系統」，透過它主體社會體認識世界，活在社會世界之中。

對〈南向專輯〉的分析，我將逐篇進行解剖。爲了不使理論、文化政治關切完全主導我與文章之間的對話，我的解讀將不受限於上述的參考點，主要以論述的內容及方向爲對話的對象，亦將帶入其他相關論述，對書寫主體本身的關切及論點也會提出回應。〈南向專輯〉的編按是我的起點。

3.1 脈絡：對雙李結構的呼應

〈南向專輯〉的編按主導了讀者閱讀的方向，並且揭示了製作的背景及動機，是詮釋循環的起點。爲了避免斷章取義的指控，全文抄錄如下：

春節期間，李總統的東南亞之行引起了諸多回響，但新聞報導與分析的層次大都偏向政經、貿易層面。有鑑於台灣與南洋諸國的文化、歷史淵源，我們製作了此一專輯，一方面也是拋磚引玉，呼應中研院李院長計劃在十年內使台灣成爲東南亞史研究中心的企圖。

一條每年固定從南洋北上的黑色海潮，一道不爲人知的生物地理線，一個法國女作家眼中的南洋華人，以及三〇年代的「南進基地」……，希望透過這一系列邊緣性的人文思考，把台灣放在一個新的角度上，省思它和東南亞及周遭區域的過去與未來。

——編者³¹

編者的「導讀」置放在版面的中心位置，發揮了居中策應的符號作用；理性的說理方式混雜了文藝腔調的詩化語言，兩者之間相互顛覆，也相輔相成；「邊緣」「性」的人文思考與政經、貿易（「中心」？）的對話，在這個脈絡裡看不出對於後者的質疑與挑戰，而是共同建構「新」的角度，建構「新」的過去，把「台灣」推向「過去的」未來——南進？

31.83.3.2 〈人間副刊〉。

編者開宗明義指出〈南向〉在雙李對應／呼應結構中所盤據的戰略位置：政經 v.s. 文化，現在政策 v.s. 歷史淵源，這裡的思考形態當然不是「西方」哲學式的二元對立，而是「中國文化傳統」的陰陽邏輯：兩極互補。李總統需要李院長才不致失之「偏」頗，李院長對李總統的「回響」也才能完成陰陽邏輯的辯證，雖然李院長一再撇清他的大型「學術」計劃（十年內使台灣成為東南亞史研究中心的企圖心）與「政治」沒有任何的關係³²。做為意識形態建構，〈南向專輯〉準確瞄準文化、歷史的場域，相對於政經層次的後盾與支撐的企圖心，呼之欲出。

從區域研究的觀點來看，「李院長」所提出的中研究院南進政策極可能較「李總統」來的早，他所提出的辯解—與「李總統」無關—頗具可信度。事實上「李院長」的視角可能較「李總統」來的更「高」一個層次，因為他長期所處的政治地緣位置，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是亞洲研究的重鎮之一；美國所處的全球資本主義戰略位置也較台灣高一個層級。因此「李院長」所處的客觀條件所提供的視野（東南亞地區經濟貿易的崛起）可能較「李總統」更具「國際觀」，更有全球資本主義頂端位置的視野。

李院長的企圖心的確龐大，美國國家機器在二次戰後為了配合新殖民主義大力推展「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從戰略觀點以「嚴謹」的學術研究來掌握全球政經文化發展狀態，半世紀以來嘔心瀝血終於成為區域研究的盟主；東亞、東南亞，乃至於南亞的研究中心當然是在華盛頓及極富盛名的大學中，從哈佛到芝加哥到柏克萊，亞洲研究中心的成立都是二次大戰以後的現象³³。李院長企圖在十年間取而代之或是並駕齊驅，大概得大量培養語言人才來面對極為複雜的東南亞各地的語言結構；另一方面最麥當勞式的速成方式就得從美國請來外

32. 參見李院長在立法院的答詢《立法院公報》（1994）。本文對「李院長」部份之分析焦點僅僅就〈人間副刊〉編案之脈絡進行討論，無關乎李院長之動機。

33. 參見 Tani Barlow (1993)。

籍傭兵，同時帶來半世紀的研究檔案，否則成為東南亞中心的說法極有可能變成天方夜譚。成敗與否，這裡無法妄下斷言，只有等待十年後的今天再做評斷。客觀的來看，李院長在中研院主導的南向政策當然不能與美國的「全方位」區域研究相比擬，但是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在配合「國家利益」、「國家發展方向」的前題下指導「學術方向」。不過清楚的是，學術服務於政策走向的路線似乎將主導中研院未來的發展方向；這是台灣學術史上最為清楚的意識呈現：以研究經費主導學術。我們將持續觀察李遠哲的宏願是否能成功地服務於資本／國家。

這裡要說清楚的是：國家機器（「南進」政策），學術研究方向（走向「東南亞」）與文化生產（「南向專輯」），三者之間所存在的不必然是動機層次上的線性因果關係，不是簡單的陰謀理論可以解釋的，而是「論述空間」結構上的「呼應」（homologous）關係，必須從論述的形式、內容及走向，才能聯結出「知識／權力」複合體的意識圖像。

編者在編案第二段裡提供了讀者論述的形式與方向：黑色海潮、生物地理線、殖民「女性」作家的敘事想像、三〇年代的「南進基地」——自然、地理、歷史、文學、生物，這些面向是書寫形式的配置。透過這些在現實世界中已經被擠壓到邊緣位置的、不為人知的故事，來重新找回歷史記憶，把「台灣」（地理名詞？國家？男人？福佬漢人資產階級？）擺在一個「新的」（政治情勢？）視野中，來發現「它」和來自南方的黑潮及「周遭地區」（中國？日本？）³⁴在過去及未來的「真正的」關係。因此，後設地來看南向專題的製作是在發現失落遺忘的過去，補白斷線的現在，才能踏實的走向未來：南方在台灣歷史中一直是在血脈裡起浮流動著。

「來自南方的黑潮」七個大字，連續兩天站在版位的最頂端，兩

34. 「周遭地區」指涉不詳，但是編案上方的圖片及說明推斷與「中國」、「日本」有關。第二天大標題下的圖片則指出「中國—日本—東南亞之間的緊密關係」。這種含混的泛稱其實豐潤了詮釋的可能性：「不可名狀」（the unnamable）所投射的是潛意識中的焦慮？敵意？還是對「父親」的愛恨情結？這個想像性他者（imaginary other）是意識形態操作的基地。後詳。

邊傾斜的樹木包超了地平線上海洋的視野，不論是要呈現「華夏文化」刻板印象下的「南洋風味」，或是台灣南方海岸線迎接著南來的黑潮，清楚的是展翅飛揚的鳥（自由的代碼或是「台灣」的化身）正飛向／降落在「南方」二字上。

「黑潮」究竟是要引爆什麼符號學上的作用？

3.2 自然化的知識／權力

在〈凝視低緯度：台灣與「東南亞運動」〉一文中，楊長鎮（1994）為〈南向去轉〉開路，把台灣放回「它原來就屬於」的黑潮文化圈。他的論證以「自然地理學」為基礎；由於海洋溫差、地球自轉、地形阻隔，在東南亞的印支半島形成一股「黑潮」洋流，因其養分與溫度所流經之地造就了「東亞稻米文明」，形成所謂的「黑潮文化圈」。在這個基礎上，作者進入「考古學」及「人類學」的領域，特別是用「平埔族是馬來系民族」的論點，來支撐「台灣原本即是黑潮文化圈的成員」的命題，只是在明末以後漢人入侵，才使台灣被納入了「中國體系」。

3.2.1 黑潮的符號意義

這裡的論述效果很明顯的是在「自然化」(naturalize)「台灣」「原本」的歸屬是在「東南亞的黑潮文化圈」，只是因為不良的「人為」因素（漢人「入侵」）才造成「後來」的「台灣」進入「中國體系」。隱藏在論述中的其實是一組對立／對應關係：自然 v.s. 人為，原本 v.s. 後來，東南亞 v.s. 中國，「台灣」身份的認定也就是在這一串符號鏈的運轉中，透過不斷的對立，建構出本身符號的認同位置。台灣→原本→自然屬於→東南亞→黑潮區，符號鏈的等價性邏輯(logics of equivalence)，召喚著閱讀主體的認可，把台灣與黑潮文化緊密的連結起來。「黑潮」在符號上發生的作用就是把台灣「還原」到它「應有」的位置，相對於人為後來的中國，它自然原本是黑潮文化圈的成員。作者的論述裡有其進步的面向，透過「原住民平埔族」與「漢人和白種

人」的對立中，呈現了原住民對入侵者的敵意，台灣自然原本是屬於原住民的。這是弱勢主體在全文中唯一一次的出場（被利用來證明台灣應有的地緣認同），從此以後消聲匿跡；在往下的敘事裡，台灣被整體化、同質化、擬人化，不再具有社會主體差異性的存在。如果將楊長鎮的論點附諸實踐，他應該提出將台灣國土及政權該「回歸自然」，交還給「真正的」台灣人—原住民，否則就只是在「利用」原住民來聯結（漢人）「台灣」與「東南亞」而已。

3.2.2 對帝國主義與東南亞詮釋的狹心症

以自然地理為基地，作者向前挺進至人為的歷史軸線。中國大帝國以延伸戰略縱深及取得經濟腹地為由，在全盛時期將影響力擴及整個黑潮文化圈。而台灣真正進入（世界）「歷史」則得歸功於明末時期中國海盜因貿易需求，打開日本→中國→東南亞的海上通路，從此台灣進入「中國史、東南亞史和世界史」³⁵。

在往下的論述中，作者觸及到一個重要的主題：帝國主義與「東南亞民族主義」的形成。根據作者的論證，東南亞民族主義的形成是經過兩波「東南亞秩序重建運動」：1. 日本資本主義的擴張，2. 以「紅色」中國為主軸的社會主義。而這兩個強權所主導的運動失敗以後，造就了日後地區合作的共識，最後表現在1967年「東南亞國協」（ASEAN）的成立，「發展出平行合作的次區域體系，作為民族國家自主、自由的基本策略」。下面我要更細緻的檢視楊文近於荒謬的論點，並逐一反駁：1. 東南亞長期受殖民及漢文化的壓抑，已經產生了民族主義，2. 日本以「大東亞共榮圈」進入東南亞，一度受到「東南亞民族主義知識階層視作解放者而予以歡迎」，3. 日治時期破壞了「殖民時代的權力構造，使壓制民族主義的權力機構潰解，從而成為東南

35. 根據丘延亮的研究，「台灣」進入「中國史」早在西元230年的〈三國志操權傳〉，被命名為「夷州」；爾後在〈隋書〉中被稱為「流求國」，1171年宋代樓鑰〈玫瑰集〉中被稱為「田比舍耶」，到1602年陳第〈東番記〉中，被明帝國主義者以「台灣」稱之，見 Chiu (1994)。台灣史有關這部份的討論，參見曹永和 (1991)。

亞民族主義勃發的臨門一腳」，為日後區域聯合奠定基礎。4. 社會主義的反帝反資產階級運動在1949年中國革命後，喚起了「恐華疑懼」，造成「東南亞人民的民族主義大體上強過社會主義，使得第二波社會主義運動為主軸的東亞重建運動被捨棄」。5. 由於長期歷史經驗造成對外來強權的不信任（「美帝」、「中帝」、「日帝」），才「發展出平行合作的次區域體系，作為民族國家自主、自由的基本策略」。

首先，作者認為「東南亞民族主義勃發」是經長期殖民、威爾遜一次戰後「民族自決論」、日帝入侵而形成。這裡要指出的是，作者混淆了「民族主義」與「區域意識」兩個極為不同的概念。東南亞諸國內部，在當時存有不同形式的國族主義，包括右翼資產階級國族主義及左翼激進國族主義，而沒有統合整個東南亞的「民族」主義。以1930殖民時期以降的馬來亞(Malaya) (1963年才有馬來西亞 Malaysia 的形成) 為例，其提出泛馬來亞國族主義，有出身農人家庭的激進馬來人開始提出反英的馬來國族主義，其中帶有泛印度尼西亞 (pan-Indonesia) 的色彩；也有保守貴族出身受英國教育反華、反印度的馬來人，與英國殖民主義合作；回教徒也開始有反西方、反帝思想的出現 (Sundaram, 1989: 216—220)³⁶。如果作者不是用東南亞國族主義指稱區域意識，而指的是東南亞各地的民族主義，那麼也不能簡單地將民族主義單一、整體化；至於有沒有區域意識的形成，以自身利益考慮而形成國家機器之間的結盟關係，及其間的階級性問題是需要被追問的。至目前為止，批判性的學術論述並沒有看到有力的分析。

第二，作者認為日本以「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入侵，「一度為東南亞民族主義受到知識階層視作解放者而予以歡迎」，這種說法不能成立。菲律賓國族主義史學家康斯坦地羅 (Renato Constantino,

36. 東南亞地區的國族主義相當複雜，階級，宗教，種族為主軸的組合，呈現出極為不同形式的民族主義。有關緬甸，印尼，菲律賓，泰國的狀況來自當地批判性論述的分析，參見 Encarnacion and Tadem (1989)；馬來西亞，參見 Sundaram (1989)，Ibrahim (1989)。

1990：14—15) 清楚的指出，當時在非除了少數投機主義份子外，根本沒人理會日帝的宣傳，並且認為這種說法相當愚昧，更談不上歡迎了。馬來亞的狀況則是雖然有馬來及印度殖民主義人士受到日本反英辭令的誘惑，但是早在1941年日帝入侵之前，就已經有華人馬來社群動員反對日帝侵華 (Sundaram, 1989：217)。新加坡自1931年特別是1937年後反日甚為高漲，1942—45的日據時期，更不在話下，(Lee Geok Boi, 1992：12—15)。作者再次以偏蓋全，簡化歷史的複雜性。更另人不解的是作者何需為帝國主義入侵辯護，來扭曲史實。

第三，作者認為日帝的貢獻在於破壞既有殖民結構「使壓制國族主義的權力機構瓦解」，造成日後區域整合的可能。但是日帝入侵東南亞不但沒有打破殖民主義對國族主義的鎮壓，也沒有為日後合作打下基礎。事實上，日據時期，日本殖民者以多種種族歧視政策打壓國族主義，就連1963年馬來西亞邦聯的形成也是英帝的運作，企圖把它在東南亞的殖民地收編在一具大傘之下 (Sundaram, 1989：219)。日據新加坡以後，原先殖民主對當地民族主義的鎮壓，特別是對左翼，相當地慘烈，(Lee Geok Boi (1992：127—130)。這些史實都與作者的論述相違背，更談不上有所謂東南亞民族主義形成的條件及區域合作的基礎。但是在作者的論證中不斷出現一些荒謬的論點，例如「大東亞共榮圈可視作近代西方殖民勢力入侵以來，東亞社會的一次重大反擊」。日帝「這一波東亞秩序重建運動却為東亞諸國留下一個重要遺產—成熟的近代式民族主義」：作者不僅肯定日帝入侵，也肯定所謂近代民族主義，其發言位置等同於侵略者在論述層次上的自我脫罪。

3.2.3 社會主義恐懼症

第四，作者認為「紅色中國建立後，社會主義運動反而喚起了東南亞國家的恐華疑懼……而捨棄社會主義」；越南革命成功更是「恐怖萬分」，而「摧化了東協」的產生。不過，反華在東南亞地區不是1949年之後才開始，從16世紀末起，華裔在當地控制食物及紡織業，就曾引起菲律賓人的不滿 (Constantino, 1992：58—60)。1949年菲共

(PKP) 在中共革命成功後，受到快速的群眾支持及武力擴充，甚至在1950年預測會在兩年內奪取政權。非共的失敗當然不是因為什麼「東南亞人民的民族主義強過社會主義」，而是因為美帝的強勢介入壓制社會主義運動 (Constantino, 1991: 289)。從該地區的批判性論述中顯示，中國四九年的革命並沒有必然造成東南亞「人民」選擇了民族主義而拋棄了社會主義，資本帝國主義從上往下對殖民地的操控是主因之一。另外必須指出，作者將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起來違反了歷史的事實，東南亞的許多民族主義運動與社會主義相互接合，而非簡單的二選一，直到今日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地仍然有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運動存在。作者以偏蓋全的辭令中暗流出對社會主義運動的焦慮。

第五，作者所提出的「東南亞重建運動」的故事結構暗藏著極為「國家機器中心主義」(Statism) 的立場，「大東亞共榮圈」是帝國機器的提法，「東協」也是國家機器的組成，視野完全受限於「民族國家」的層次而沒有看到批判性論述的存在；康斯坦地羅在1989年出版的《國族主義與解放》一書中即痛批「東協」是跨國資本、帝國主義的買辦 (Constantino, 1989: 37—38)，他更進一步質問：由資本家所促成的跨國經濟合作，是東協的國族資產階級建立區域自主的努力，還是成爲破壞人民爭取自主性的敵人？從這樣的角度來看，作者對東協與東貿的美化是從特定的立場、位置，與國家機器／資本的視野相互呼應。「東協」唯一的進步性在於與西方帝國主義的競爭，但是資產階級所主控的國家機器間的結盟，對當地人民絕對是保守反動的。

〈凝視低緯度〉所導向的結論當然是「回歸自然」：冷戰後經貿區域切割是「主流」國際政治運作，「台灣在東亞弱小國家序列中，基於歷史經驗和現實處境雷同，而走向東南亞，毋寧是極其自然的結果」。從自然出發，走回自然，作者的論述位置與國家規劃師的結構位置極爲一致，如果真是那麼自然，爲什麼在雙李出車之後，才「自然的」跟著放炮？

小結楊長鎮的論述，可以發現到他(1)相當一廂情願的來改寫「東亞史」，(2)敘述角度極度的右翼，(3)目的不過是在攻擊社會主義，(4)將台灣「還原」到東南亞，為南進辯護，效果上為帝國主義辯護。我期待楊長鎮公開提出他對東南亞認識的資料來源，檢查資料的論述立場，否則效果上只是從權力集團觀點企圖灌輸右翼觀點。

3.2.4 演化論／學術／帝國

楊長鎮自然化「南進」的論述策略，在劉克襄〈一條消失的線〉的手中，再次被使用，只是沒有前者來的那麼粗暴。劉克襄企圖找回的是十九世紀生物地理學發現的華勒斯線：這條線串連了台灣和東南亞的密切關係。在他的論述裡，展現了相當有趣的知識與權力，學術與帝國的緊密關係。首先，劉克襄指出華勒斯是進化論的信徒，而達爾文以降的物種演化觀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確實提供了西方帝國主義向外殖民擴張的理論支持³⁷，因此以進化論為基礎的生物地理學研究就與帝國連結起來。從英屬殖民地馬來群島劃出的華勒斯線，到了日本帝國主義時期找到了繼承香火的傳承，劉克襄有非常生動的描述：

這條生物地理線背後所代表的生物學和人類學知識，線內線外的東南亞離島、半島，都吸引了是時旅台日本生物學者，急欲前往那兒進行有系統的科學研究，尋找它和台灣，甚至和日本之間的關係。對日本當局而言，東南亞是南進之地；對不少生物學或人類學者，那兒卻像是鯨魚回到繁殖場那般吸引人。

科學知識追尋的慾望，急切的慾望，不只是為科學而科學，更是要挖掘出殖民地與母國在自然科學上的關係，這種致命的吸引力，「這種南方的召喚」，使得學者們冒著生命的危險，與帝國一同南進。嚴格的說起來，沒有帝國南進所提供的物質基礎，華勒斯線的追蹤研究可

37. 華勒斯其實與達爾文是演化論共同的發現者；更有趣的是華勒斯本人是社會主義者，也因此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對演化論的濫用，參見 Jones (1980: 10-34) 第二章〈達爾文，華勒斯與社會理論〉，有關演化論與帝國主義參見 Hofstadter (1965)，特別是種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一章。感謝傅大為提供資訊。

能早已斷線，沒有權力的擴張就沒有知識的生產；反過來說，無法在科學上證明日本→台灣→東南亞，在古代就存在了「密切淵源的文化相和文化層」，帝國就無法對他的南進自圓其說。這可能就是「這種學術的明確內容」，也正是它想要「證明」的。這條線是不是能負載，其實不需要等到「未來」，楊長鎮的知識生產已經為帝國未來權力的擴張完成了負載的任務。

敏銳的分析家們難道嗅不出他們的剖析裡已經翻出了這種文化生產與帝國形成的共謀關係？那麼，為什麼還要選擇為「南進」抬轎呢？恐怕只有分析到最後，我們才能找到合理的解釋。

3.2.5 拷貝帝國主義文化想像

讓我回到薩依德所激發的命題。上面的分析裡，展示了「南進論述」對於帝國形成在意識形態層次上的支持，它的操作透過將事物自然化來完成，看來葛蘭西 (Gramsci) 意識形態理論依然寶刀未鏽；對葛蘭西來說，最「自然」的就是最意識形態的，將事物自然化是意識形態操作的原則之一。同時分析也展現了帝國主體（「台灣」）透過拉近與他企圖殖民對象（「東南亞」）之間的關係，來拉遠它焦慮的敵人（「社會主義」「中國」），來找到它新的、原本就有的自我認同。更揭露了舊帝國主義者所構築的文化想像（如，華勒斯線，大東亞共榮圈下的東南亞秩序重建運動），依然卡著了被殖者的想像空間：「南進」的文化論述的新帝國建構之文化想像，不過是日帝在半世紀前所編造文化思維的翻版、再版與盜印。歷史書寫作為一種文化想像的表現形式受制於舊帝國世界觀，在以下被分析的文章中更為清楚。

3.3 台灣中心論：帝國主義的借屍還魂

吳密察的〈重新認識台灣的位置〉的書寫形式是南向專輯所有文章中最索然無味的一篇，除了開頭將「台灣」在地圖上重新定位之外，以後的書寫是以年表大事記的體例，從十四世紀中期形成東亞、東南亞的貿易體系，到十七世紀荷帝東印度公司的運作把台灣推入「世界

史的舞台」，十九世紀末台灣成爲日本殖民地，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日帝戰敗前夕爲止。這種書寫形式雖然像是一張張幻燈片的閃過，旁白也異常的冷靜，不似具有書寫主體慾望的投射，也難以喚起閱讀主體認同 (identification) 的慾望，但是也正是鏡頭將讀者擺在觀景的位置，攝影師才能躲在鏡頭的後方，爲「我們」一幕一幕耐心的解說，相當「有系統」的引領我們一同走過從前，用敘事的起點及終結框架出「台灣真正的位置」。簡單的說，〈重新認識台灣的位置〉爲〈南向專輯〉的整體企劃提供了以台灣爲中心，書寫「台灣史」的線性歷史縱深，在楊長鎮與劉克襄以自然爲基礎的「南進論述」之外，開展出「歷史」的可能性。

「吳密察」這個符號同時權威化 (authorize) 了這篇文章在「學術」上的重要性，它代表了社會空間裡極具象徵意義的學術發言位置 (enunciative position)：台灣史的專家、台大歷史系教授、重要半官方學術機構「蔣經國基金會」、對日、韓開發的諮議委員……這樣的專業論述位置到底會和「南向」產生什麼樣的接合關係呢？³⁸

吳文的開始與結尾，前後相互呼應，主角都是「李總統」，使讀者立刻進入現實的脈絡，也標識出歷史書寫的時空。「李登輝下南洋」³⁹，使「我們終於『發現』了」「一直就在我們身邊」的「鄰近地區」。不論「我們」是誰，爲什麼會有這種現象的發生呢？爲什麼我們到現在才發現東南亞就在我身邊？這個問題確實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吳文沒有回答，但是從楊長鎮的文章裡可以找到片面的答案：這些弱小國家以前實力不夠，現在逐漸崛起形成區域聯盟，所以資本／國家機器的心態大概也不得不西瓜靠大邊的趕快黏過去。從台灣過去半世紀的經驗來檢查，政治、經濟、文化各面向關係最爲密切的是兩大殖民宗主國：美、日，從殖民到新殖民歷史結構性的傳承，使得「我們」被套

38. 相關學術著作，參見吳密察 (1991)。

39. 引自王振寰 (1994) 文章的題目，這篇文章幾乎是唯一的一篇批判性論述，從資本的立場切入解剖南進政策對工人階級造成的負面影響。

牢在這個被分配的位置當中，也就無法「發現」台灣和第三世界、東南亞各地類似的被殖民歷史經驗。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吳文接下來提出「長期以來，以亞洲大陸為中心的地圖限制了我們的思考」只能部份成立，因為我們與亞洲大陸直到解嚴後才開始發生關係；半世紀以來，限制了我們思考的是以美日為中心的地圖。

吳文的核心論點是：

李總統的訪問路線，為我們勾畫出一個早已實存，卻被我們視而未見的台灣之地理位置。那就是：台灣→菲律賓→印尼→泰國（中南半島）→台灣所圍起來的海洋世界。……

以亞洲大陸為中心的地圖，無法看清楚台灣真正的位置，及歷史的地域性展開。如果我們將台灣放在地圖的中心時，便會看到一個全新的景象：台灣正在東亞（東中國海地域）和東南亞（南中國海地域）的連結點上。這樣的位置當然相當程度決定了台灣歷史的展開，並預示了台灣的可能性。

簡單的來說，〈重新認識台灣的位置〉是要改正以往以亞洲大陸為中心（錯誤）的定位，重新把台灣擺在地圖的中央，才能找到「台灣真正的位置」：連結東亞和東南亞的關鍵點，是東亞加上東南亞的中心。這裡我們似乎可以看到楊長鎮與吳密察的差異，前者以「回歸自然」的論證方式，急於把台灣推向東南亞，後者則有格局更大的戰略佈署，不放棄東亞，但同時走向東南亞；而兩者的共通處則在於站在國家（機器）同質化整體位置，為「南進」找尋歷史上的依據。

然而，吳密察「台灣中心論」的憑據到底是什麼？在他的歷史大事記裡，讀者大概可以捕捉到兩次的歷史經驗，更準確的說是三次。第一次是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從日本、台灣、東南亞，一直到南亞的印度大陸，到處遍設商館，這一次「台灣中心論」還不是那麼明顯。第二次更為清楚的展現是在廿世紀台灣的日據時代，日本的南進大業以台灣為中點站，向東南亞推進，從台灣、華南、東南亞，一直到澳洲，到處都有拓殖業務的發展。兩次歷史所涵蓋區域不完全相

同，但是如吳文所言，第二次「不免讓人聯想到十七世紀的東印度公司」。其實，最爲傳神的台灣中心論是一九四四年朝日新聞出版的書中的一幅地圖，「將台灣置於大東亞共榮圈的中心」。對於讀者而言，最爲具像的呈現是在三月三日〈人間〉版位的中央：一幅以台灣爲中心，一圈一圈向外擴散的地圖，編者所加的圖片說明是：「三四十年代有些日本學者常以台灣爲中心思考整個大東亞關係」。第三次的歷史經驗當然與前兩次不同，也就是「李登輝下南洋」，在他「此次外遊座機的航線，似乎讓我們又看到了這張地圖」（吳密察語）！

這三次不同的歷史片段到底對我們有什麼「啓發」呢？吳密察的論述裡其實已經給了很明確的答案：這三次歷史經驗唯一的相同處就是殖民帝國主義向外擴張的野心。更後設保持點距離來看，吳密察台灣中心論（「將台灣放在地圖的中心」）的提案，「真正的」視野其實來自於殖民者所建構的文化想像，半世紀以後在被殖民者的提案中借屍還魂。

台灣真的是帝國的中心嗎？

3.4 帝國、資本、種族的性交媾

楊波〈神秘的華人〉以第一人稱的敘事形式出現，從旅遊經驗回到童年記憶，將台灣與南洋的勾連起來。在效果上，作者柔軟的筆調使讀者在其他艱硬的文章之間，暫時找到喘息的空間。也就是在讀者鬆弛意識的短暫片刻中，個人主觀性的聲音被擴大上昇成集體的精神分析投射，相當有選擇性的建構了「人民記憶」（popular memory），以記憶置換了歷史的大敘述，更強而有力的將主體、資本、帝國與性（別）串連成認同的位置。在書寫的過程中，「個人的即是政治的」浮現了它的結構性意義，經由「家庭史」的片斷，「文化中國」的政治基礎也被暴露出來。

3.4.1 弑父情節的歷史記憶

作者以觀光客／（人類學家）身份進入東南亞所進行的「後殖民

研究」，其中心／基地是台灣，而一旦進入南洋的敘述中，觀察者的慾望焦點就擺在「我」與「神秘的華人」之間的辯證，進而轉化成華人與殖民者的辯證，被排除在辯證視野之外的則是所有「當地其他民族」（唯一出現的時機是與華人利益的衝突）。

作者「後殖民」式的「好奇」心引領讀者回到他的家族史，回到大歷史的潮流，回到越戰及更早的日據殖民時期。回到家族史的情緒（affective）作用是處理幼年弑父的罪惡感：親友往來南洋跑單幫，父親所經營的保險業及海上運輸貿易，「我小時候不以為然」，但是「我現在又可斷定『跑單幫』並不比『台商』可恥」。對於小資本的衝突感情（ambivalence），「讀書人」對於資本的懷疑，則必須透過訴諸生命的勇氣重新找到與父親的認同：「畢竟，敢以買賣為重，不以蠅頭小利為輕，正是海外華人（自然亦包括台灣人）的基本生命形態之一」。也就是在與跑單幫者與南進先頭部隊台裔的同情性認可中，同時找到了與海外華人的認同。我前面提到這是一種高度選擇性的人民記憶建構，是說在作者的書寫裡有高度階級、種族、性別的排他性（exclusion），在他認同慾望的投射裡，母親、替父親工作的工人，乃至於與海外華人共同生活的其他（other）人種，都無法進入「我的」歷史的記憶。

作者衷心的關切是「海外或是南洋華人到底是怎麼一種人呢？在其他族群眼中的華人又如何？」這兩個問題的重要性在於，自我「主體性」的建立，必需在與他者的互動中才能不斷的轉換，不斷的形成；如作者所言，「這似乎是一種『知己知彼』的基本工作」。有趣的是，作者面對問題的方式並不是經由當地其他族群的書寫中來找到答案⁴⁰，而是透過兩本殖民者的文學書寫來找到自我（華人）的認同。作者對於康拉德在〈吉姆爺〉中華人「負面形象」的建構非常不以為然，而在莒哈絲的《情人》裡找到了他認同華人（以「台灣人」為核心）

40. 該地區對於華人意像的敵意，參見 Leo Suryadinata (1975), Constantino (1992)。

的可能性。

3.4.2 「莒哈絲」與「文化中國」的性交

在整個〈南向專輯〉的設計裡，這是「女性」唯一出場的片刻（在「南進論述」中，女性主體找不到或是不願意有發言位置，也沒有被給予發言的空間，整個〈南向專輯〉的書寫主體都是異性戀男性；這是否意味著女人「不夠資格」對這個議題發言？我的解釋是，女性評論不願意與「南進論述」共謀。），文章的上方是梁家輝在〈情人〉電影中的劇照，編按說明：「電影《情人》中的中國男人」；被圓圈框起來的男人下方是文章標題〈神祕的華人〉，再往下是作者的名字「楊波」；被「壓在」最下方的長方形照片裡，是一站一坐的兩個女人，圖片說明裡我們得到的訊息是「印度支那1930年，十六歲的莒哈絲身著安南服飾與她的同伴合影；那年在湄公河的渡輪上，她邂逅了一個中國男人後來成為『情人』的化身。」這張照片中，莒哈絲處之泰然的地坐著，身旁的「同伴」則站在椅子的右後方，兩人的目光都朝著攝影機（看著讀者）；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位階關係在此呈現，並不是地位平等的同伴（如果楊波有歪讀的能力，甚至可以辯論兩位女性之間的「同志」（同性戀）可能性；當然這不是他所投射的「異性戀體制」所容許的慾望）。更為有趣的是，作者筆下莒哈絲的情人已經不再是「華人」而是「中國男人」。在從頭到尾的描述中，作者把隱而不見的台灣（男）人、「南洋華（男）人」、與「中國男人」串連起來，彷彿進入新儒家建構下「文化中國」的認同世界，排比出作者身份認同的轉變。在作者的刻劃中可以讀出這種文化認同運作的機制：

書中敘寫少女莒哈絲在湄公河畔與中國情人邂逅、相戀，兩人在經濟上、肉體上的關係恰好代表了白人殖民階級與被殖民者關係的一種逆轉。……無論如何，在華人形象的塑造方面，此書是一里程碑。非常富有的中國情人，斯文而有吸引力，依然神秘（甚至不乏詭譎），但展現在小說中、在改編的寬銀幕上，卻是對華人的一種承認（recognition），一種不規避的正視。

在「錢、性與權力」⁴¹的擺盪中，不是莒哈絲用非白種男人來建構女性主體，而是被殖民者以資本／性的優勢位置，在交媾中重拾男性、種族的認同，經由被白種女人慾望的位置來完成被殖民的救贖。這確實是一種逆轉：以資本為後盾，被殖民者取代了白人／男性／殖民者的位置。至於書寫主體強烈認同的「文化中國」男人（富有、斯文、有吸引力、神祕），所被「承認」的又是那一種承認？

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一書中，對殖民地被殖民男人與白女人之間的情慾關係有一段精細的解釋：

我期盼被認可成「白人」而不是「黑人」

這種承認的形式是黑格爾所不曾設想到的——除了白女人還有誰能給我這種承認？藉著她愛我證明了我是值得白人愛的。我像白男人一樣的被愛。

我就是白男人。

她的愛引領著我走向高尚的道路，朝向完全的實現……我與白人文化、白美人、白人的白人性結合。

當我焦燥的雙手撫摸著白人的乳房時，我的雙手抓住了白人的文明與尊嚴，並且使得這些成為我的。

(Fanon; 1967 : 63)

從法農（自我）精神分析的論述中，我們可以認識到書寫主體急於被承認的慾望，是要取而代之成為殖民者，成為白男人而不是認可黑人的存有，這就是逆轉。當然，這裡法農對殖民情慾的分析在理論邏輯上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楊波作為書寫主體的結構性傾向 (disposition)；然而「中國人」或「華人」在歷史邏輯上並不能完全等同於黑男人的位置，前者對後者不但歧視且經常透露出其種族中心的優越感。對於「文化中國」而言（例如從新儒家傳統的杜維明），黑人（非洲、加勒比海地區……）幾乎不在文化中國的視野當中；相對而言，

41. 參見 Hartssock (1983) 《錢、性與權力》一書。

「法國文明」在中國沙文主義的世界裡，却是西方文化極為「神祕」與羅曼蒂克的極至。「莒哈絲」與「梁家輝」的交媾其實從「文化中國」的角度來看，是東西文明最為「優秀品種」的媾合，在媾合高潮中得到「西方」世界中最有「文明」的國族的「認可」，證明中國文化的「經久不衰」。保持點距離來看，文化中國的潛意識中充滿著不被認可的性焦慮，才會以資本優勢來「買回」其中國（男性）的「尊嚴」。而書寫主體文化中國的認同位置對於「海外華人」其實是有相當的壓迫性，在居住地被邊緣化，子女被強制學華語⁴²……更嚴重的是「文化中國」裡強烈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意識形態運作；在〈神秘的華人〉裡，除了經由「西方、白人、殖民者」來建構華人的主體認同外，東南亞地區多元種族根本不能進入文化中國的眼界。這種自戀的自我中心主義，不願公平對話，不把沒資源的人看在眼裡，正是帝國主義殖民意識形態最根本的操作模式。文化中國作為對抗西方文化霸權的策略，却在中國 v.s. 西方的對立架構中，以種族文化（更精準的說是漢人）為核心，複製文化帝國主義的殖民特性。

3.4.3 「本省男人」v.s.「外省女人」：性交出頭天

透過性交過程中的（男性）暴力來找回「信心」是殖民狀態中處理壓抑焦慮的共通策略。楊照（1993b）在〈往事追憶錄〉的中篇小說中相當粗暴地寫到：（此時的場景是男主角的追憶部份，對女精神分析師進行的口淫）

「我可以感覺到，在遊戲間她的器官已經有了充分的準備，溼滑的黏液甚至滴流沾在我的腹腿間，可是我幾次試圖移動身體以便插入，卻遭到她刻意的抵抗。她用雙掌按住我的胸膛，突然問我：『你愛我嗎？』我當然說：『我愛妳。』她抿著嘴想了一下，鄭重地說：『可是我恨你。』我覺得胡塗了，說：『妳怎麼可能恨我？』『我當然恨你。』她說。一面說著她把我停頓下來的手重

42. 參見 Ang (1993) 有關文化中國的認同對華人造成不利狀況的討論。

新挪回她的乳暉附近，然後用溫柔然而堅定的口氣說：『告訴你你是個外省人。』我照著說：『我是個外省人。』她閉起眼睛來，導引我的手向更敏感的部位游走，說：『再講一遍。』『我是個外省人。』我又說了一遍。

「然後她突然起身，用手把我充血得發痛的陽具塞進她的陰戶裡，接著開始熱烈地上下運動她的臀部。我沒有防備她會馬上這麼進入情況，差點就立刻破功射了出來。還好在緊要關頭硬咬牙吸口氣忍了下來，就在那個當口，她一面動作著，一面閉上眼睛仰起頭來喃喃唸著：『我恨你們這些騎在台灣人身上四十年的外省人；我恨你們這些強姦這塊土地的外省人……』到高潮引得她全身電擊般亂顫時，我都可以聽見在濁濃的喘息中，嬌淫的呼喊間夾著：『台灣人出頭天』的語音……」（楊照，1993b:88-89）。

在這一場近乎暴力的媾合戰爭中，男性閱讀主體被召喚成與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認同對象，然而書寫主體此刻賦予女性位置相當主動、積極、強勢的主控位置，成為書寫主體的認同對象；也就是「利用」女性來發出對於「台灣人」對「外省人」的仇恨；達到高潮的並非第一人稱的「我」，而是「全身電擊般亂顫」的「台灣人」。因此，其間突顯了男性書寫主體的雙重認同：1. 認同「台灣人」（而非女人）2. 認同台灣人的對象—「外省（男）人」（彼可取而代之）。為什麼是認同外省男人呢？作者在下一場戲中寫到：

「可惜有一些老習慣卻無法立刻丟開。我將她放在床上，試圖要用我的吻揭開一道新劇新幕，她卻制抑不住地尖叫起來。她還不能接受我在上面的相關位置。而且她還是不能不說：『可是我恨你。』她愣愣了一下，我趁機採取主動進入她。她有一陣不預期的痙攣，然而立刻習慣性地挪動臀部配合我動作的節拍。她的呼吸開始濃重起來，可是她還是努力地要說話：『可是你是個外省人。我討厭外省人。』我討厭這個過時了的話題讓我不能專心享受腹腰間的廝磨。我試圖喚醒她：『那只是妳原來的藉口，

妳不是真的討厭外省人。』她放慢了陰道肌肉收縮的頻率，側過臉來帶點疑惑地說：『我是真的討厭外省人。所以我才會跟你這樣。我喜歡世界倒過來，台灣人騎著外省人的感覺。』這話弄得我簡直啼笑皆非。我用力地頂了幾下，讓她感覺到那種真實的肉體交合的接觸，然後強調地說：『我們兩人之間的關係是愛情，不是什麼台灣人、外省人。』愛情這樣的字眼果然使她溫柔下來，她緩緩地扭轉著臀部，四兩撥千斤消解掉我激切進攻的衝力。不過她還是說：『愛情是愛情，不過我還是壓著一個外省人。』

「我覺得她固執得近乎不可理喻了。一點怒意燒上來，我忍不住把這個遊戲最根本的謊言基礎拆開來，我告訴她：她騎的其實是個台灣人，不是外省人。接著我們之間展開了認識以來第一場爭執，到後來我甚至把陽具抽出來，光著身子掏出身分證給她看，那真是個荒謬的對比，光裸裸的我竟然需要一張身外的小卡片來證明我的存在模式，而那張卡上明明白白地記錄著我是台灣彰化人的事實。」

「這樣解決了爭端之後，我們重新回到床上，繼續未完成的性愛部分。可是我可以察覺到她的心不在焉。一切都結束後，我忍不住問她：『妳不喜歡？』她竟然搖著頭淌下淚來，輕輕地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我覺得你今天特別霸道……』」

「從那之後，我們誰也沒有再找過對方。我找不到理由再去接近她，可是奇怪的是：那些被她緊緊壓在床上作愛的經驗卻一直魅惑著我……」

「妳能替我解釋這是怎麼一回事嗎？」（楊照，1993b：90）

男主角這裡所面對的是女性精神分析師，迷惘地希望能夠得到解答。或許我們可以這麼回答：這裡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已經較上場戲中逐漸取得主動權、不願意再承受「外省人」一直被「台灣人」討厭的罪名；「台灣人」（女主角為符號）企圖讓「世界倒過來，台灣人騎著外省人」，男主角此刻為了取得（台灣人）男性發言的強勢位置，只得

訴諸國家機器的權威，從國族—國家的基本建構身份的配置—「身份證」一來證明「我是台灣彰化人的事實」。當然，結果是「她」終於認識到「台灣（女）人」其實是受到「台灣男人」的宰制，所以說「我覺得你今天特別霸道」，因為今天的你已經不是「外省人」，取得了比「我」更為強勢的台灣「男人」位置，我為「同族」人所統治。也正是當認識到「我們都是台灣人」、已經「出頭天」的台灣人的同時，誰也就沒有再找過對方，也「找不到理由」去尋找對方，因為翻轉的快感已經不再存在，「台灣人」騎在「台灣人」身上（不論誰在上、誰在下），都無法再有征服原來「殖民者」的快感，不再有認同「外省人」可以換取的優勢位置。從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論述位置來看，一旦他表態是「彰化人」，就造成了「她的心不在焉」，喪失了施暴的慾望，甚至「淌下淚來」，認識到「台灣男人」的霸道，而無法成為被慾望的對象，此刻若回頭重新認同「外省男人」，恐怕得向國家機器重新註冊、取得新的身份。一旦台灣人已經出頭天，也就喪失了性交戰爭中的對抗對象。

把楊照的故事擺回九三年台灣的政治／社會氣氛來讀，福佬男性（「被殖民者」）企圖利用女性來完成他歷史任務——推翻並取代「外省殖民男人」——的強烈慾望，他的敘事邏輯恰巧平行到「李郝體制」的瓦解與「李連體制」的「台灣人出頭天」。二楊（楊波／楊照）福佬男性資產階級沙文主義的認同位置，是相當清楚的了，而性交不過是上層政治鬥爭的轉喻。

有趣的是，楊照在其小說中似乎看到取而代之後的焦慮與問題（台灣人騎在台灣人上面），如果是這樣的話，1994年的楊照（在「南向專輯」中）已經沒有他在1993年來的冷靜，已經正式進入他所認知到的體制之中。

更為後設的來看，書寫主體被掩藏起來的潛意識投射，其實是「本省男人」的認同，經由「外省女人」得到「外省人」的認可，以清除自卑的被殖民焦慮，從而認同「外省男人」過去的優勢位置；這整套

潛意識慾望的流向與楊波的「男性華人」對「莒哈絲」的慾望政治，邏輯上幾乎一致：要得到殖民者的認可，並取而代之。至於楊照何以翻轉，遮蓋這層性關係——從「本省男人」v.s.「外省女人」到「本省女人」v.s.「外省男人」的意淫式想像——基本上投射的是異性戀觀點下的性焦慮的病態性徵候，底層上所展現的是一種「雌雄同體的自姦」。

這條殖民／被殖民軸線下透過性交的征服性暴力來抒解焦慮／壓抑、找到自我肯定的精神史 (psycho-history) 需要被全面性的展開來研究。這裡已經看到楊照、楊波的慾望形構邏輯，其他的小說家諸如李昂（《迷園》）、陳映真（《夜行貨車》），亦有透過性關係來處理政治議題。在這個被殖民男性、殖民主女性與殖民男權體制的三角架構中，「看不見的第三者」（殖民男性），往往是被殖民男性所認同而又要取代的敵人；當然處於三角的頂端是父親（殖民者），而三角一端的「女性」不過是被用來連結被殖民者與父親之間的親密關係。用（印度殖民心理學家）南地（Ashis Nandy, 1983）的話來說，即是在殖民文化中兩個不同位置的男人之間存在「親密敵人」的關係⁴³。從賽朱維克（Eve Sedgwick, 1985）的同志理論來看，這是主流異性戀「男人之間」社會性同性連鎖（homosocial bonding）的慾望。如果將這兩種理論交插起來，所呈現的則是殖民文化中，男性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利用、犧牲女性來完成彼此之間的連結，活出權力關係上親密的愛恨關係。

3.4.4 帝國、資本、種族、性／別

在以上的分析裡，楊波〈神秘的華人〉呈現出南進論述中更為「深層」的精神分析機制，以次帝國主體企圖翻轉過去被殖民的壓抑位置，重新取得自我的認同；而這種強烈被承認的慾望只有在進入原先殖民者的文化想像空間裡，經由對異性、異族、異階級的宰制性交媾，才

43. 南地繼承了法農《黑皮膚、白面具》的傳統，Fanon (1967)。

能得到紓解，也在這個慾望形構中投射出帝國主體的階級、種族與性別位置與認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中心主義、男性沙文主義、資本主義的交叉接合關係，在「南進論述」的慾望形構層次，展現了相當坦誠的自我剖白。

3.5 從邊陲到中心：「本土左派」的帝國慾望

〈南向專輯〉的重頭戲是一連刊載三天的長文〈從中國的邊陲到南洋的中心：一段被忽略的歷史〉。相對於「吳密察」的學院、學術發言位置，「楊照」的論述空間更多元、活潑：顧秀賢（1994：3）將他定位在「文化批判」的場域；譚石（1994）把他放在「文學批評」系譜裡，承續了葉石濤、陳芳明的傳統；他也是前反對黨主席許信良寫作《新興民族》幕僚小組的一員（張娟芬，1994）；更重要的，則是在接受《光華》雜誌訪問時所自許的「本土左派」發言位置（李光真，1994；楊照，1993a：6—18）。「更重要的」意思是說，在本土右派新保守主義主導的南進政策走向中，本土左派會如何面對，如何發出「異議」的另類聲音在文化論述層次提出批判性的「介入」。也就是說，在台灣今天的社會空間裡，仍然還願意頭頂「左派」的符號，它的「殘餘價值」至少應該是站在認同被宰制群體的立場，揭露右翼政治、經濟、文化霸權結構的權力宰制關係⁴⁴。

3.5.1 誰是我們？

楊照和吳密察一樣，都是以「李總統」的南行來開啓書寫／閱讀的現實性歷史脈絡。但是更誇張的是，楊照認為他的南行不僅是「炒熱了南向的話題，突然之間，全台灣都把眼光看向南方，急切地希望在那裡找到未來的遠景」。突然之間，楊照自身的急切膨脹成「全台灣」都要在東南亞「找到未來」⁴⁵，儼然他是在替所有的人代言。事實上，文章從頭到尾，楊照筆下的「我們」、「台灣」、「台灣人」都全然面貌

44. 楊照從台大到哈佛的正統史學訓練也是他論述的基礎，參見晏山農（1994）。

模糊，沒有社會的差異性——「台灣進入後期資本主義階段，升級為資本擁有者、輸出者」；這裡「台灣」、「資本擁有者、輸出者」，明顯地不是台灣的工人階級或是原住民（也相對投射出作者的認同對象？）。「南向可以說正是紓解台灣社會對西進的集體焦慮」；這裡「台灣社會」明顯地不是台灣統派份子，或是與統獨立場不掛鉤的女性主義者

.....

楊照把這些關鍵性主體字眼視為整體 (totality) 的效果不僅是在抹消差異性，更是以個人、部份的慾望投射來替「所有人」發言。諷刺的是，這也正是楊照的左派立場所要攻擊的：「為什麼男人的觀點可以不經言明的代表所有人？」（楊照，1993a：15）。

從楊照從頭到尾全稱代名詞「我們」的使用，讀者除非把它視為反諷，否則在以下的分析裡，我們不能將楊照的論述視為是有「批判性距離」的；換句話說，從整體的論述來看，他並不是在進行全面性的反諷，否則他應該會清楚陳述自身批判性的立場，對南進直接批判。因此，以下的分析將視楊照所有使用的「我們」，為他所代表的意識形態的立場、認同及慾望的投射。以下使用「楊照」不僅指稱個人，也是立場的反射。

3.5.2 統獨架構下的南進世界觀

與其他文章不同，楊照開門見山的點破「南向」與「西進」的緊密關係：「南向」是「西進」中國大陸之外的另一種選擇。關鍵問題在於是誰的選擇？資本？國家機器？「本土左派」？還是他們共通的選擇，因而才會相互呼應？從反帝的立場來看，南進與西進、東進沒有差別，都是帝國向外擴張的表現。那麼，楊照假設的差別到底在那裡？

楊照略帶有唯物論色彩的分析，把焦點擺在資本的積累及流向（但是他並沒有追問是誰的血汗換來了資本的積累），台灣過去是資本的

45. 這裡不是在做人身指控，楊照在一九九三年嘗試建構的〈本土左派世界觀裡〉，是以「台灣—中國—世界」及「本土、異文化」為主軸，「東南亞」並沒有清楚地進入他的地圖（楊照，1993：16），除非「東南亞」就是世界？

輸入地，而在「進入後期資本主義階段，升級成為資本擁有者、輸出者」（如果說有資本能輸出就是後期資本主義，那麼三個世紀前的帝國主義早就處於後期資本主義階段了！）。以楊照來看，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於「過去低自主性的情況下，我們一般只能接受別人既有世界圖像安排，選擇極其有限；現在我們却必須拿出自己的一套理解、建構自己的世界觀，才有辦法有信心地拿出答案來」。在這裡楊照用「國族主義」的使命感來號召「我們」，共同為國家的未來貢獻心力、尋找答案。有趣的是他的遣辭用句似乎有些反諷，在我黨化教育的記憶裡，這些熟悉的語氣只會來自於國家元首、公司董事長、或是傳統大中國知識份子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強烈使命感。特別是擺在論及資本輸出方向的脈絡裡，楊照的論述位階相同於國家機器經貿政策的制定者，透露出異常國家機器中心主義（statism）的意識形態，而非社會空間裡的邊緣左派。

在上面的引文裡，楊照提出整篇文章的核心問題意識：建構一套新的世界觀。在這一小節的討論裡，要問的問題是：這套世界觀的內容是什麼？它的作用在哪裡？往下的分析裡要追問的則是：楊照這套世界觀的來源、基礎又是什麼？

楊照世界觀的建構在前面已經提到是對著「西進」而來，也就是對立於西進，建立南進的世界觀。這裡他抨擊的主要對象是「大中華經濟圈」的概念（以中國大陸為核心，包括台灣、香港、新加坡的華人經濟區），主因在於它是「台灣試圖建立的新世界觀中，一套頗佔優勢的架構」。楊照認為這套主流架構的文化基礎在於國家機器長期形塑的「中華民族主義」，以「反帝反封建」的論調對抗西方及日本。而在實踐上，它的問題會是：1. 這個經濟圈會受中共極權官僚控制，以致於無法維持經濟力，因此「根本令人無法放心」；2. 大中華民族主義會招來鄰近地區的敵意。在不放心與敵意的情況下，「台灣（官方、資本？）終於被逼到要全盤重新整理、清算舊世界圖像、世界觀了」。這個圖像就是南進，「讓台灣回歸東南亞、回歸南洋」。這裡楊照與楊長

鎮與吳密察、雙李相互呼應，而南進的作用則在於1.「紓解台灣社會對西進的集體焦慮、迷惘的初步解脫」，2.它的「真正意義」不在資本利益，而在宣示「大中華經濟圈不是我們無可逃躲的命運」。

楊照與吳密察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後者知道「台灣真正的位置」在哪裡，而前者則認為地理位置的擺放是「文化的建構 (Construction)」，不具「科學的唯一真理」。但是在楊照的建構中，他使「台灣究竟應該屬於中國、或者屬於南洋」的選擇，「回歸」到後者，而不意識到這是他的「文化建構」，却把回歸的建構訴諸「集體心理的共同產物」——可是，效果上他的論述就是在打造這種集體心理。我要說的是，集體心理沒有先驗性存在的本質，是在既有的歷史條件下營造、建構的過程；從〈南向專輯〉，更可以看到這個營造集體心理的實踐，及營造的作用者。

在楊照的舖陳裡所投射的「焦慮和迷惘」，需要被擺回台灣權力集團所收編、動員的統獨之爭來理解，或許會使問題的面貌更為清楚。對於統派而言，不分在朝在野，資本邏輯所「自然」形成的西進，最終將使台灣與大陸統一；這種經濟法則對獨派而言，不分在朝在野，是一種「集體焦慮、迷惘」，甚至不知所措。所以「南進」為「國家台獨與人民台獨」帶來了紓解與解脫；因此，楊照也才會說，南進「真正的意義」不在於經濟利益，而是宣告統一「不是我們無可逃避的命運」。政治謀略者推動南進的戰略動機在這裡無需被揣測，在文化論述的呼應中，可以看到從西進到南進的選擇，幾乎成為二選一的二元對立邏輯，而這個在意識形態／慾望層次操作的邏輯結構正是統 V.S.獨的鏡像二元論，絕非「左派」觀點；兩者的共通處也就是楊照所攻擊的「(中華)民族主義」：他沒有講明白的是如果西進的意識基礎是「中華民族主義」，那麼南進則是奠基在「台灣民族主義」的建構，也就是被殖民者從邊陲到中心的慾望。

在進入中心之前，楊照的論述中已經坦白地展現了一連串的對立關係：西進 v.s.南進，中國 v.s.台灣，統一 v.s.獨立，以及每組詞項間

的呼應關係。

3.5.3 從邊陲到中心的慾望

如果南進是一種以「台灣」為本位（帝國）新世界觀的建立，那麼將台灣「回歸」東南亞則是逆轉邊陲的宿命論，走向（自我）中心的強烈慾望：「從中國的邊陲到南洋的中心」。透過歷史的重寫、地圖的重畫，楊照的論述效果在於召喚「我們」（閱讀主體）進入國族想像的「集體圖像」，不再自我設限於邊陲，而在翻出過去片段歷史處於中心位置的「光榮」基礎上，重建中心的自我定位，滿足精神分析上的需求。

在這個面向上楊照以中心／邊陲的概念重覆了吳密察編年史。從荷帝、明帝、清帝、日帝、中帝，一直到美帝，台灣一直處於非中心的邊陲位置，唯一的例外則出現在日據後期，「台灣在經濟、文化各方面其實已經儼然是南洋的中心」。這是楊照重寫歷史的關鍵點，需要小心被對待。從上面3.3節對於吳密察「台灣中心論」的分析裡，我已經指出這種地圖想像視野的建構其實來自於殖民帝國主義的文化論述，這裡要進一步挑明，當時的台灣中心論並不是以台灣（台北）為中心，它更後設的中心是日本帝國（東京），台灣的地理位置被用來做為南進的轉接中心點。如果只是把台灣放在地圖的中心點來看世界地圖，就可以說「台灣是中心」，那麼台灣以前是中心，現在是中心，未來也會是中心，也就不必忙著改寫歷史了。當然，這裡牽扯的問題不只是「地圖」的問題，而是國族想像的精神分析「地圖」。可悲的是，做為反帝的左派主體位置，居然會從殖民者的文化想像中「拷貝」歷史的片刻，來重寫「台灣史」。

也就是為了建構台灣中心的國族想像，「本土左派」才會「痛苦的妥協讓步」，來改寫歷史：楊照的核心論點是，其實日治後期，台灣已經不是殖民地，而是日本國土的一部份。

這確實是令人痛苦的抉擇。在3.4節的分析裡，我已經指出，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慾望關係裡，後者強烈需要被認可的慾望使得

他被吸到殖民者的世界觀裡，包括他看待歷史的角度。法農在《大地之不仁》寫到，「殖民者創造歷史，而且是有意識地在創造歷史。因為他不斷地「重造他母國的歷史，他很明顯地表示出他是母國的延伸。因此，他所寫的歷史不是他搶奪當地國的歷史，而是撇清了所有罪惡後的母國史」(Fanon, 1968: 51)。而被殖民者之所以會採取殖民者的歷史觀點，除了長期的殖民教育之外，也有潛意識的精神分析機制：「當地人從未中止夢想將他自己放在殖民者的位置——不是夢想成為殖民者，而是以他自己來取代殖民者」(Fanon, 1968: 52)⁴⁶。

歷史的改寫也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中，接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書寫角度，再次展現帝國文化論述視野仍然暗藏在「台灣人」的血液裡，左右了新世界觀建立的歷史基礎。悲劇⁴⁷。

3.5.4 歷史的改寫：從殖民地升級為國土

楊照改寫歷史的策略性目的是在建構南進世界觀的過程裡，建立以日帝的角度提出台灣中心論的正當性。透過對矢內原忠雄名著《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的質疑來展開論點，也就是在承認矢內對日帝剝削台灣指控的同時，宣告「我們也不能忽略一件事實：矢內教授的名著寫的是殖民前期的情況，絕大部份的資料只蒐集到一九二七年」。楊照的意思是日治史在一九二七年左右是一個斷代，日治後期，「內地延長主義」的作用，以台灣為南進中心，快速進行工業化，以致於「放棄對台灣的殖民剝削利得，換取更有效地掌握南洋的機會」。在日帝南進政策逐漸付諸實踐的情況下，「台灣從典型殖民地升級為內地延長國土、南洋中心，對台灣一般人生活、意識上產生的影響，間接地削弱了反抗的強度」。難道，一旦被升級為國土，一旦統治技術改變，矢內對日帝的指控就不成立了？「台灣」就取得了主體性，不再是帝國統治下的殖民地？這是楊照的論述效果，但並未清楚的寫出。這種說

46. 法農這裡只對了一半，在〈南向專輯〉的分析裡可以看到成為殖民者的夢想。

47. 根據毓秀的說法：帝國心態不只來自日本，而是自古中國與台灣特殊教育情境所孕育的「泱泱大國」心態。

法如果成立，香港早就不是英帝的殖民地，因為英國對香港的統治較日帝更為鬆緩，（在大英國協的旗幟下使香港成為英在亞洲的根據地之一）。以此看來，「本土左派」的改寫歷史是為了換取台灣是南洋中心的論點，而為日帝脫罪，這種犧牲的代價未免太大了一點，「歷史斷裂」的意義難道只是為了說明一九二七年以後台灣已經脫離了高壓式的殖民帝國統治時期？而事實上一九二七年後日帝對於台灣左翼的鎮壓並未終斷，較「本國」來的更為強暴；根據張炎憲（1994：36）的說法，一九三一年台共遭日帝逮捕入獄，各種反抗也遭鎮壓，而不是楊照所說的，反抗自然消失。

在把台灣升級為中心之後，楊照繼續向南推進，把台灣和南洋縫合在一起。配合楊長鎮、劉克襄的自然論，楊照也提出了有「實證基礎」的文化論，這不但表現在台灣最有錢人蓋的建築物都有「南洋風味」，也彰顯「台灣是南洋的一部份的印象，在日本殖民者心目中烙刻尤深」。在一九四〇年代初，台灣終於成為日帝在南洋的中心。

楊照敘事的收尾前，有趣地引用戰後的研究，說是早有人提出「台灣有志，應代替過去日本在南洋的商業地位」（承續帝國主義的大業？）。不論自願或是被迫，都可以說是「台灣歷史上唯一一段擺脫邊陲宿命，逐步走向『中心』意識的特殊時間」。

楊照從近來「日本研究殖民史的修正主義史家」的觀點重寫台灣史，無非是要論證台灣曾經是日本國土的一部份，是南洋的一部份，而不必然是中國的邊陲部份，也只有在「南進」的實踐中，台灣才能脫離邊緣，重新成為南洋的中心⁴⁸。楊照接著指出縱使理論基礎來自日治台灣的歷史經驗，但是那時候台灣已經不是標準的殖民地，使用殖民者的觀點也說的過去，只要能從痛苦的邊緣走向未來的中心。

楊照的歷史重寫可以被視為台灣史研究中「對日治再肯定運動」的一個環結，《日本文摘》（1994）〈太陽旗下的台灣〉專輯的整個制作

48. 根據康乃爾大學亞洲研究日裔教授 Sakai（酒井直樹）指出，楊照所指的「修正主義史家」都是右翼史學家，替日帝這一波的擴張找尋正當性的理論基礎。（1994年5月）

結果就是在肯定日帝的成果；舉例來說，李鴻禧即分別從法治、教育、警察、衛生、工業等場域印證日帝所「締造出來的成果」（編案，頁14）。這種實証主義的論證方式極為荒謬，「法律制度」是殖民主義所強加的，與在地的社會只是形成主義的連結而已，目的不過在「以客觀理性的態度，為讀者尋回這段失落已久的歷史」；遮蓋了獨派台灣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如果把這種論點擴大，同樣可以用來肯定美帝，或者四九年以後國民黨政權對台灣貢獻的成果。這種選擇性的歷史重寫不過是基於獨立建國的立場，借深化日台關係，淡化中台關係，從歷史中將「台灣」抽離中國。相對於國民黨的大中國主義，台灣國族主義可以說是孿生兄弟，一體兩面的鏡象關係。

3.5.5 拿來主義的左派：本土國族主義

在閱讀整個〈南向專輯〉的過程裡，所有的論述都提及帝國、殖民的過去，然而居然沒有任何文字用過去的歷史經驗來反省台灣當下的南進政策，是一種殖民、帝國向外擴張的表現。我們原本期待至少宣稱「本土左派」的楊照，會從反帝的觀點，就算不攻擊，至少會點明這個歷史的新流向並提出警訊，但是相較其他作者，楊照對於南進的辯護更為赤裸、更為自覺。那麼我們（泛左翼）是不是對「本土左派」的理解失之偏頗，沒有認識到左派在台灣的主體性是要與國家機器／資本／次帝國相呼應？我們被迫要重新認識「本土左派」？

在〈一個本土左派世界觀的嘗試〉一文中，楊照對「本土左派」提出較為清楚的界定。首先他把「本土」和「左派」一刀切開：「理想主義的形式架構裡，我所追求的一致性建立在兩根支柱上：一是本土、一是左派」（楊照，1993：12—3）。對他來說，左派不是傳統上的理解（反資本主義，及各種形式的壓迫），不是社會空間中的主體位置，不是一種認同、不是一種自我的期許，而是一種「拿來」主義：「也許長期批判、監督資本秩序的左派觀點，很值得我們拿來作為嘗試與世界連絡的新起點」（楊照，1993：15）。更有趣的是，對他而言，左派的定義「大致說來」，「強調以分配、公平而非生產、效率為中心原

則」，看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政治經濟學，竟然可與左派無關。沒有人有剝奪任何人宣稱自己是左派的權力，世界各地的左派也都沒有蓋棺論定的看法，倒是在各地左派處於一切低迷氣氛之中，台灣居然出現了一種怪異的「拿來主義左派」，不談階級，不談宰制，也不反帝，反倒與資本、國家機器相互輝映，頗有幾分邁上執政之路的架勢⁴⁹。雖然左派不只一種，也沒有一種界定，但是可以確定的是為資產階級男性福佬沙文體制服務的是本土右派，而非本土左派。楊照的「本土左派」就是本土右派。

如果說「左派」是拿來的，那麼本土左派的前題、優先性認同位置及立場則是「本土」，就像統左的優先認同是統，獨左的優先前題是獨一樣，左派都可能只是拿來用的，隨時可以因應狀況的改變而丟掉，這也部份解釋了「本土左派」會與本土主流右派攜手合作的原因。但是，「本土左派」所指的本土又是什麼呢？楊照認為本土的意義有兩點：1. 「是判斷的一種，也是一種立場的表達」，奠基於「對台灣本土的了解」，進而採取行動；2. 不是本質主義的本土論，要「勇敢面對曾經對這塊土地產生影響的所有因素」，面對日帝造成的日本經驗，國民黨外來政權所造成的中國經驗，「重建一個可以面對日本、面對中國的整體多元本土國家」。相對於舊本土論的「狹窄」，楊照的新本土論是要有新的世界觀，「承認：現下台灣社會台灣文化是各種不同源頭舶來元素衝擊中的拼貼物」，才能有選擇性的形塑台灣的未來，也就是「重建……整體多元本土國家」；用我的話說，就是建立新的「國族——國家」(nation-state)⁵⁰。

這裡，我們再次看到楊照的國族主義宣示，本土的意義，就是「以本土為中心來選擇性地理解異文化、異社會」，也就是從「台灣一中

49. 楊照最近對「本土」及「左派」的談話，可參見他在《光華》雜誌的面談（李光真，1994：91—92）。

50. 呂正惠對新舊本土派曾經作過有趣的區分，舊本土派他稱之為「土獨」，新本土派為「洋獨」。而楊照正是後者的縮影。

國一世界」、「本土、異文化」的兩軸交織，發展出「立足台灣、胸懷中國、放眼世界」的立場（引自中國國民黨一九九二年選舉文宣品）。這種本土中心主義論當然不是楊照所獨有，其實反映了更為普遍的知識份子心態。

在另一個層次上楊照近乎荒謬地將此「台灣—中國—世界」的「三環結構」視為「國際主義」（楊照1993，7：10）；而他的「國際主義」與國際左翼傳統毫無瓜葛，指稱的都是資本、旅遊資訊的「國際化」，這種說法難道不是右翼資產階級發言位置的投射，而沒有絲毫左翼國際主義的認識。

從國族主義自我中心的意識形態的結構，我們也就更能解釋「本土左／右派」亟於建立新國家的理念及慾望，才會拋棄「左派」去與「南進」的「國家政策」相呼應。更進一步來看，從楊長鎮與劉克襄的自然說，吳密察的台灣中心論，楊波的種族中心被認可的慾望，楊照從邊陲到中心的想像性構築，乃至於總體〈南向專輯〉的企劃，就能夠在當前台灣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結構中找到位置，也才能更結構性地解釋這群文化論述為什麼會與政治體制南進政策相輔相成。

3.6 被收編的台灣民族主義

以台灣意識為基礎形成台灣國族主義的歷史形構，至今眾說紛紛，沒有一致的看法，不同的敘事反映了不同的意識形態立場。然而大致上而言，論者都同意台灣意識是在長期與殖民者的對抗中逐漸形成，大部份的論述也都以種族、族群、民族、國族的主軸來建構台灣意識⁵¹。

3.6.1 「台灣人意識」論述的陷阱

以漢人為中心的論述大致上會同意「台灣的歷史是一部被殖民史」（邱貴芬，1992：1），也才會導出「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史觀，將原

51. 不同階級及意識形態的論述如，吳三連及蔡培火（1971），史明（1980），史新義（1988），《台灣評論》（1992），施敏輝（1988），楊碧川（1988）。

住民「五千年歷史」視為史前史（史明，1980：11）。所以嚴格來說，四百年史所指的是原住民自主性被剝奪的殖民史。在夷將·拔路兒與拉娃告·賴歌拉克（1992）所舖陳的〈台灣原住民的發展史〉中，就明顯地呈現出這種史觀，十七世紀荷蘭、西班牙殖民之前，「台灣原住民仍是台灣島這塊土地唯一的主人」（1992：33），爾後一直到今天，台灣史才是「台灣歷代外來殖民統治政權」支配下的歷史。從原住民弱勢族群的立場來推演，只有在他們重新成為主人的時刻，台灣才能宣告殖民時代的結束。同樣，對台灣工農階級主體，同性戀及女性主體而言，只有當她／他們當家做主，才能算是去殖民時期的到來。這些論點當然不會是強勢族群國族主義的立場。

然而，不從階級、性別及弱勢族群觀點來思考、建構台灣國族主義，却單一地以族群、民族做為前題，是漢人男性資產階級論者的一大盲點；一旦以族群、民族為主軸，所有的思辯、論證就變的「單向思維」（Straight Mind, Wittig, 1992）其他的軸線完全變成輔助主線的進行，甚至完全消失。以史明著名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為例。他一方面從階級觀點批評日據時期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份子出身地主、資產階級或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1980：688），也劃出國民黨四九年以後統治的社會裡誰是剝削階級，誰是被剝削階級（1980：1059—64），但是另一方面他仍會達到這樣的結論：

二二八大革命的「反阿山」鬥爭中……徹底打消了因與中國人同一血統所產生的意識上的瓜葛之後，台灣民族主義，即渴求台灣民族的獨立解放、主張其民族利益、並關切其民族的命運與前途。這個完整的民族理念終成為台灣人唯一且最高的原理。（1980：1096）

在唯一且最高的原理下，泛階級問題退入背景、位次。

同樣的論述方向不僅在革命家史明論述中發生，學院中的族群、民族主義研究、論述似乎未能更有批判距離地來看待族群分類系統的官方建構。王甫昌的族群融合研究根據「一般所接受的官方界定方式」

(1992: 2—9) 以籍貫為區分，階級、性別、乃至於原住民都消失在他的分析中。期待日後社會學界的分析會質疑官方分類，使得研究者與官方分類下資料之間能夠產生批判性距離，在最後挑戰官方形塑範疇的社會效果。張茂桂以安德森 (Anderson, 1991) 將國族視為「想像的政治社群」概念，探究台灣民族主義，用「部落偶像」來解釋八〇年代以後興盛的「台灣獨立建國運動」(1992: 6—14)。他雖然引|用了史明的階級觀，但是却沒有追問是誰在建構部落偶像？是誰在構築想像社群？接合主體的階級、性別、族群的組成是什麼？⁵²這裡，我們也期待社會學者未來的研究，能夠追問這些問題也才不至造成在合理化權力集團的新國家打造運動的論述效果⁵³。

因此，面對國族主義時，我們必須追究它的接合主體，國族運動的獲利群體及歷史集團 (historical bloc) 的階級、性別、種族屬性，而不能天真的認為它是「集體」的文化慾望；換句話說，我們不能用以偏蓋全的辭令而不追問是「誰」在建構、運用、收編國族主義及國族認同，不能不問它對誰有利。誠如波多黎各籍的理論家布勞特 (James M. Blaut) 在名著《國族問題：去殖民化國族主義理論》的核心論點所言，「國族鬥爭就是階級鬥爭，它是一種取得國家機器權力的階級鬥爭形式，並且它不是一般自主 (autonomous) 的力量」(Blaut, 1987: 24; 詳見57—100)。布勞特的意思是說，國族主義的鬥爭可能是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的對抗，也可能是無產階級奪權的擴大結盟策略，或是國族資產階級處理內部危機、弭平內部差異的置換策略。拉克勞 (Ernesto Laclau) 以納粹為例，稱後者為宰制階級的民粹主義 (populism of the dominant Class) (Laclau, 1977)，霍爾以余契爾新保守統治為例，稱之為威權式民粹主義 (authoritarian populism) (Hall, 1980)⁵⁴。新加坡的女性主義者，也批判新加坡的

52. 三好將夫對 Anderson 的批評就在於，他沒有解釋是「誰在想像這個社群」(Miyoshi, 1993: 732)。

53. 詳細的社會學批判，請見趙剛 (1994)。

國族主義對女性及少數民族的壓迫，在結論時強烈地指出：「女人，以及所有女性的符號，在定義上就經常也已經是反國族的」(Heng and Devan, 1992: 356)⁵⁵。八〇年代中期以後的同性戀團體更喊出建立「同志國」(queer nation)的運動口號，挑戰國族認同的排他性⁵⁶。本土同志論述更進一步的提出，「人們在同性戀方面的性向（或品味）遠比異性戀更為國際化，更為天下一家（不分國籍、種族、膚色）上」（李幼新，1993：8）；本土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也說，「我們活在不同的本土、不同的國度裡」⁵⁷。

3.6.2 台灣國族主義的理論邏輯結構

從這樣的觀點，或許台灣民族主義會浮現不同的圖像。台灣國族主義史確實可以從泛階級的觀點來建構，其內容與形式，主體與作用者在不同的歷史環結有所轉換⁵⁸。然而，這種史觀在台灣史既有的學術論述中却非常少見。從一六三五年以原住民為抗爭主體反荷的「麻豆大反抗」事件起（史新義，1988：83；林華洲，1992：45），台灣掀起解放運動的開端，對抗的主軸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階級鬥爭。歷經明鄭、滿清的殖民統治，日據時期的民族運動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第一次大戰後民族自決及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台灣共產黨從階級矛盾及種族矛盾觀點提出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應該是台灣民族主義在論述上的開端。

戰後，國民黨政權對台灣進行下一波的殖民⁵⁹，成為「外來政權」（李登輝語），並將台灣從日帝手中抽出，鑲入美國新殖民主義結

54. 詳見陳光興(1988, 1992: 167—183)及Chen (forthcoming)。

55. 本土女性主義者對於國族主義的挑戰，請參見〈島嶼邊緣〉(1994)。

56. 「同志國」1990年在紐約建國，參見Cruikshank (1992: 176—177)。台灣女同性戀團體出版的《愛福好自在報》(1994)，第二期即以同志國(Queer Nation)為主題。

57. 這段引文未經文字化。

58. 此處的「階級」不必然與「正統」社會學傳統下的用法一致，此處融合Bourdieu (1987) 視階級慣域(habitus)的構成由社會、文化、經濟資本所組成，及女性主義者Wittig (1992)的看法，視女性為被宰制階級後擴大的概念。此處的「泛階級」觀強調多重切割線向邊的宰制關係。感謝柯志明對我階級界定不清所提出的質疑。

構中。根據官方資料，一九四五年起就將漢人分成「本省人」與「外省人」(Johnson, 1990:120)，二二八事件統治者的鎮壓向下擴散形成長期「省籍矛盾」及強化了「台灣人意識」。至此，台灣民族主義的鬥爭對象即是以省籍差異切割敵我的主軸。四、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統治，切斷台灣左翼民族主義，台灣獨立建國運動流亡海外，以美日(新舊殖民主)為結集點。統治階級所主導的中國民族主義，為維持其政治合法性，將「中共」(共匪)建構成團結內部一致對外的敵人，「反共」也就成為「基本國策」，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共識」(common sense)，美日帝國主義就不再是民族主義反抗的對象。這個假想敵在兩岸政權雙方關閉往來的狀態下，持維了四十年，直到解嚴以後，假想敵被具像化，特別是六四事件(及近期「千島湖事件」)，反共成為台灣民族主義操作的場域，接收、承續了中國民族主義長期建構反共的常識，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假想敵。

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使得中國結 v.s.台灣結、中國意識 v.s.台灣意識。中國認同 v.s.台灣認同的爭辯搬上檯面，使台灣民族主義能夠在社會空間裡再次被論述化⁶⁰。

在社會力逐漸凝聚及反攻無望論的內外壓力下，國民黨政權在蔣經國的推動下開始進行本土化的座標轉換，準備伸根台灣，從此不說反共抗俄，只談國家統一。「台灣國民黨」的形成以此為開端，它的基本架構完成轉化則是在九三年李郝鬥爭中，象徵「中國」國民黨系統「非主流派」的倒台，也就是國民黨文工會副主任施克敏所謂的一場「寧靜革命」；九四年中央黨部的拆除則是象徵意義上一個舊時代的結束。

從台灣民族主義的立場來看，這一場為期五年「寧靜革命」

59. 即使是中國民族主義論者，也應承認這是內部殖民。陳傳興(1994)將種族與階級之間的曖昧競爭性聯結起來，是對台灣現代性解釋最有趣的提法。

60. 這場論戰官方及非官方論述均加入戰局。八〇年代中期並年以文學為核心的論戰在「黨外」陣營再度展開，參見施敏輝(1988)所編的《台灣意識論戰選集》。

(1988—93)的鬥爭主軸是擺在中國 v.s. 台灣的省籍差異，而又上昇至國族認同的矛盾上，而權力集團的內部鬥爭也再次向下擴散，再次引爆潛藏在慾望結構中的省籍情結。台灣民族主義長期搭建的台灣人意識在這裡與「李登輝」這個符號相接合。陳芳明在批評國民黨「獨台」走向時，就對「李登輝情結」有一針見血的談法：「李登輝之所以成爲台灣社會的情結，只不過是他具有台灣籍而已，除此之外，他與台灣社會、台灣民意沒有絲毫牽連。李登輝只憑藉籍貫就可以討好台灣人，這是台灣人的悲哀」(1990：140)⁶¹。而對有台灣人意識的人來說，在數百年長期被殖民的經驗裡，要能夠取殖民者而而代之的強烈台灣人出頭天的慾望，却是異常的深刻。過去政治舞台上可見的 (visible) 的政治符號都是「外省人」，而「李登輝」則是台灣人「當家做主」的具體表現。在近代台灣民族主義以族群政治爲操作前題，階級意識缺席的情況下，「李登輝」(漢人、福佬、資產階級、異性戀、男性) 正式接收正在沸騰的台灣民族主義及台灣人意識的能量，成爲台灣民族主義的接合作用者，在執政後開始修憲、推動國會全面改選、加入聯合國等等，朝「新國家」營造的路上邁進。在意識形態及慾望結構上，當李氏使用感性辭令—台灣人的悲哀，以及直接的吐出「真言」—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的同時，反對黨過去所操作的基地，至此全部被瓦解，收編。

總結來看，蔣氏集團在戰後所營造的大中國沙文主義替台灣社會帶來了無窮的禍害，透過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教育、媒體……)強加至台灣社會沒有根基的黨國文化，以法西斯式的貫輸方式來改變台灣現代性的形構(陳傳興，1994)。一方面想要剷斷日本的殖民文化，另一方面強勢介入社會的各個層面，以白色恐怖的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 造成至今無法抹除扭曲的集體精神結構 (psycho—structure)，到今天所有的溝通，互動形式，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與疏離

61. 據瞭解，「李登輝情結」及「台灣人的悲哀」的提法，均是陳芳明的創見，見陳芳明(1990:136—141)。

……都是被迫害、被殖民意識扭曲的結果。父權心態、耳語、貼標籤、非友即敵、人情包圍、暗鬥等法西斯文化形式在今天台灣社會（特別是在白色恐怖成長的年齡層）依然在廣泛的操作（在野黨、反對性社會運動亦不例外）。這些都是蔣氏所營造中華國族主義的產物。

另一方面，高壓、箝制的文化策略也就相對地儲存，引爆了台灣人意識的反抗情緒，深化了台灣國族主義中的被殖民、被迫害情結，從「點」的反抗（心理、個人行為），逐漸形成線面結集，擴散至公共空間。做為大中國沙文主義的對立體，台灣國族主義的進步性在於對抗統治集團的惡霸式運作；同時它也在鏡像對立中學到了（複製）大中國的潛意識鬥爭形態，繼續想要透過國家機器從上而下的方式來營造新的國族文化，而不是主動基極的使弱勢群體有更大的自主性空間來建立不同於國族主義主體的文化主體性。

蔣氏中國國族沙文主義的瓦解由台灣國族主義所延續，李氏的台灣國民黨福佬沙文主義總結了本省／外省官方設定及動員的鬥爭架構；從歷史—理論邏輯上來看，為反體制的台灣國族主義劃上句點。對運動的出路何在？請看下節的討論。

台灣民族主義也就第一次在歷史上成為統治階級的利器，這其實是「台灣人的悲哀」之所在，反對意識被轉化成為統治權力集團打建新國族一國家的情緒基礎構造。或是說得更明白些，「台灣國民黨」收編了過去數百年所累積的台灣人意識所承載的動力，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刻中轉化成向內奪權、向外爭取「台灣人」認可的意識形態力量。在下一個階段中，以國家機器／資本為核心的台灣民族主義，將是對抗中國民族主義再一次上場的時刻。

4. 「破」國族的文化想像：新國際在地主義的觀點

在這一個部份的討論裡，我將總結對「南進文化論述」的分析，把它放回台灣的政治社會脈絡；接著對統合南進方案的台灣國族主義進行理論上的解構與重構；最後，我將回到本文開始的問題意識

——第三世界的文化研究。過程中，我將繼續深化新國際在地主義的人民民主理論觀點，將國族主義重新定位，及提出「破」國家的另類命題。

4.1 「帝國之眼／我」

從以上的曲折的分析過程中，本文標題「帝國之眼」的接合作用應該是相當的明顯了：文化論述作為台灣次帝國的眼睛來觀望「世界」，「南進」建構新的「世界觀」，其實是透過舊帝國的眼睛來張望周遭。在3.3及3.5節中我們分析出了次帝國與舊帝國觀景角度的一致性——3.3節中舊帝國所繪製的地圖赤裸裸的展現帝國之眼所建構的文化想像；而這雙眼睛在歷史的動態過程中沈澱、內化，在六十年後的今天才又再度在次帝國的雙眼中自我呈現。

但是嚴格的說來，舊帝國與次帝國的眼睛確實有觀景「位置」距離上的差異。觀看世界的眼睛其實預設了它的身體置身何處，暗示了觀景主體（我／I），沒有「我」就不可能觀看世界；而「我」是這站在什麼樣的地緣政治位置及被放置的主體位置（subject-positions）多元決定了眼中所浮現的世界或是其建構世界的文化想像。舊帝國的我所指涉的是二、三〇年代東京的帝國南進總部。大和民族、男性、資產階級主體位置；而次帝國的我則是九〇年代台北南進的（原）日帝總督府，漢人福佬、異性戀男性、資產階級位置。兩者在歷史的轉變中有呈現的差距，只是地緣政治位置及「種族」上的差異，福佬漢人取而代之了大和民族（更準確的來說，兩種帝國之眼的政治潛意識相同之處在於其「種族中心主義」的慾望的投射）。重要的是，我們看到了其間歷史的傳承，有斷裂也有連續；舊帝的我所創造的文化想像，內化在次帝的身體之中，形塑出「他」的自我，他的世界觀，他的想像。

4.2 國族／國家／帝國：三位一體的霸權方案

從以上對〈南向專輯〉的分析裡，在第2.4節所提出的問題可以被

回答了。

第一，「南進論述」的文化政治意涵是什麼？「南進」作為台灣次帝國主義形成的表現形式，充份地獲得「南進論述」中文化論述——〈南進專輯〉——全面性的支持，為南進從地理、歷史、文學等各方面提供意識形態層次的理論基礎。

第二，「南進論述」的操作機制是什麼？內容及形式又是什麼？徵召帝國主體的策略，是透過建立與其企圖殖民對象（「東南亞」、「南洋」）的歷史、地理、文化關係，以及原先殖民主（荷帝、中帝、日帝以及略有觸及的美帝）的關係，來自我界定；也就是藉由地圖的重劃、歷史的重寫，建立起「台灣」與他者在歷史、地理上的相對關係，找到「台灣」的新身份、認同。

第三，「南進論述」的歷史性來源是什麼？這種新身份、新認同的「發現」幾乎完全來自帝國主義者在歷史轉折中建構的文化想像；過去的被殖民者在企圖成為新殖民者的過程中，充份地挖掘了過去殖民者的文化想像，在轉用的同時，接受了殖民者所形塑的視野。台灣中心論、台灣是南洋的中心、華勒斯線、乃至於莒哈絲，都有明顯的殖民帝國的烙印與再拷貝。這意味著去殖民的工作完全沒有展開，而只迫切地為了搭配南進，回到「台灣史」裡找尋台灣中心論的基礎，所能挖掘的資源不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鬥爭，而在帝國主義所建構的文化想像力上。這也是我在分析過程裡深感悲痛之處。由次來看，「台灣史」的書寫要能真正的去殖民化，就不能只看反抗，而要擺在殖民與被殖民的辯證關係中，才能掌握反抗的被制約性，以及反抗中對殖民者認同的精神機關。這或許是去殖民的第一步。

第四，「南進論述」的意識形態構造是什麼？被殖民者的被殖民情結，為統治階級收編，使台灣國族主義與國家機器主義、殖民帝國主義緊密相聯結，在意識形態層次上造就了台灣次帝國形成的慾望及正當性。

總結來看，支撐台灣次帝國的「南進論述」，必須被擺回台灣當前

政治地形圖中，點出它的關係位置。在全球資本主義重組的擠壓下，以及台灣內部政治鬥爭、在野黨、社會力挑戰的多重壓力下，由國家機器所主導的政治經濟權力再結構，是由三條交織的主軸共同形成的大型方案——國族營造 (nation-building)，國家機器 (再) 打造 (state-(re)making)，次帝國形造 (empire-forming)。這個三位一體霸權政治 (hegemonic politics) 的接合主體是父權漢人福佬沙文主義的國族資產階級 (national bourgeoisie)。它的統合原則是以前台灣國族主義為基地，企圖收編解嚴後集權體制瓦解過程中散放出來的社會力。這個以國族主義為統合原則的霸權操作延續了蔣家國民黨的策略，將「中共」建構成假想敵 (imaginary other) 來營造「中華民國」及「中華」國族主義及「大中國」意識，現在仍然同樣地繼承這個傳統將「中共」形塑成巨大的敵人，以掩蓋階級、性別、種族矛盾，來「統一」「台灣」，再鑲入以美帝為霸主的新殖民結構，「向外」剝削處於全球資本主義結構中更為劣勢位置的地區之勞動力、生態及資源⁶²。從這個角度來看，「南進」及其相關文化論述是霸權方案的重要環扣：這個一石數鳥的戰略接合了1. 長期形塑的台灣意識；2. 徵召慾望主體進入國族主義的主體位置以台灣國族能夠向外擴張為榮；3. 強化、加速國家機器重新打造之威望；4. 次帝國意識的形成不僅搶奪到經濟利益，為資本流向找尋出路，也躋升國際舞台，向國族—國家建立的目標邁進。也正是在這些多重戰線的配置下，我們才能理解以民進黨為首的在野陣營在此刻不但得啞口無言的簽名背書（因其意識形態的利益被納入霸權方案），還得積極地提供理論彈藥（以期逆轉西進造成經濟統一為前導的方向，從中國大陸抽離出來，邁向獨立之路）。但是，「中華民國」早在蔣氏特別是蔣經國時期，已經形成一個國族—國家，而新國族的營造（「中華民國在台灣」）不過是為了重造國家機器，收編反對勢力，沒有真正的新國族 (nation)，但是有新的國家 (state)。

62. 這個詮釋性命題是丘亞飛 (1993) 有關國族主義論述更進一步的發展。

在這樣的總體戰中，文化論述的操作場域集中在歷史的再書寫；台灣最近幾年充斥著一種現象，就是大量歷史被重新創造，台灣史的研究也不斷的風起雲湧，如重審美麗島，二二八或白色恐怖等；而主流文化機構更大量建構過去歷史，如《天下》的〈一同走過從前〉，國策中心的《編年史》，台視的四十周年慶的重構電視史，金馬獎的台灣電視史…。這種大量歷史的書寫或改寫是在搶奪歷史的詮釋權，這詮釋權是具有前瞻性，而非完全對過去的回溯。很多的歷史書寫常常是從自己的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立場而寫，其目的可能是為了獨立建國或鞏固既有的權力結構，重要的作用是非常有選擇性的來組織人民的記憶。因而所謂人民集體的記憶，並不是客觀存在的，而是透過這種歷史書寫重新組合出不同的意識因子。這種集體的記憶直接、間接的在政治場域裡展現，可能會變成什麼呢？如要根據書寫內容要形塑「國民」的認同，重新構築「台灣」歷史，不管民進黨或國民黨其實都是在做同樣的事情，就是新國家的建立。

整個歷史寫作既是非常有選擇性的，有一種歷史寫作的方法，就是去消除歷史的記錄、抹殺不利自己位置的記錄：拆除中央黨部。其實從國民黨抹殺歷史的觀點來看，真該拆除的或許應是總統府，因為它的存在承續了日本總督府做為「外來政權」的歷史符號。「台灣國民黨」這次寫歷史的方式是用推土機，想把四十年痛苦的歷史記憶予以剷平，重新開始；然而這樣的從頭開始却仍是奠基於過去的力暴力及極權統治，反霸權論述不允許痛苦的記憶就這樣被抹殺了。論述策略上可以把原訂的二二八紀念碑擴大，搬到這空間來，把過去的傷痛完整的留在這個空間，遙望過去帝國的統督府、過去及現在的國民黨政權總統府，未來的民進黨空間或所謂台灣共和國，逼得執政者記住台灣過去發生的事件，讓執政者天天去面對這些歷史的記憶。

4.3 解構／重構國族主義：「破」國族與「破」國家

在這樣的歷史經驗中，任何反霸權立場的論述與實踐都需要重新

思考台灣民族主義到底是不是在與虎謀皮？以下從理論層次上提出幾點討論。

第一，誠如拉丁美洲現棲居倫敦的意識形態理論家拉克勞所言，民族主義沒有本質，要看它與什麼樣的論述及階級主體相接合來判斷它是進步還是反動的（Laclau, 1977: 143—98）。在不同的地理、歷史、時間、空間等多元決定中有不同的內容與形式。歐陸的國族主義是帝國主義向外殖民的意識形態基礎，甚至發展成種族歧視的法西斯主義。但是，第三世界的國族主義曾經是反帝、去殖民的統合性力量，但在建國後成為倚賴性新殖民政權。因此，國族主義有其極為進步的可能性。菲律賓的國族主義理論家康斯坦地羅就指出，第三世界的國族主義可是「反壓迫的鬥爭，是防衛性而非攻擊性的武器，是民主而不是反民主的動力……過去是反殖民的意識，國族主義在新殖主義時期要對抗新形式的剝削，在效果上重整獨立的鬥爭，這一次是在經濟的領域。最後，國族主義要擴大、深入多元社會抗爭，消滅所有形式的剝削」「國族主義是抗拒所有的剝削，但是它必須開始面對主要的剝削力量——新殖民主義的控制」（Constantino, 1988: 22—23）。因此，進步性的國族主義要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特別是新殖民結構中的經濟剝削（台灣次帝國的南進政策正是菲律賓國族主義反抗的新殖民主義⁶³。反觀台灣各種形式的國族主義，不但不反父權、不反種族歧視、不反異性戀體制，不反階級宰制，更不反新殖民帝國主義（美、日），反而自己想成為次帝國。

第二，理論研究中顯示，許多的國族主義都強調「國族的利益及價值較其它所有的利益與價值都具有（絕對的）優先性」（Breuilly, 1985: 3）。這種耳熟能詳的官方國族主義，以「國家利益優先論」抹殺不同種社會主體的利益，非官方的「政治運動不去區分人民之間的

63. 根據筆者一九九三年在菲律賓開會期間所做的「田野調查」，菲律賓學院內外的知識份子對台灣南進蘇比克灣非常反感，稱之為台灣帝國主義。本文的寫成受惠於她／他們的觀點，特此致謝。

利益差異，那就是新國家（機器）主義（statism）」（吳永毅，1994：104），也就以同樣的邏輯在壓抑其他社會主體的利益及價值觀。法農這麼說，如果國族主義「不能豐富、深化成爲社會與政治需求的意識，也就是人道主義，它就會走進死巷子」（Fanon, 1968：204）。也就是因爲台灣民族主義沒有在社會主體群不同的需求上來建立雄厚的基礎，才會如此輕易地爲國家機器所收編。

第三，以建立國族—國家爲目標的國族主義經常沒有認識到國族國家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發明、建構。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過程裡，以國族主義爲基礎的國族—國家被製造成現代、進步的表現，來證明其文化上的優越性，來辯護殖民主義的正當性。搭配著發展主義、現代化等意識形態，「國族—國家」變成一個規範性（normative）概念，被用來丈量一個地區是否達到現代化的指標之一⁶⁴。以獨立建國爲目標來自我期許，多多少少有落入以帝國主義的眼睛來丈量自己的可能性。民族國家的建立是不是第三世界地區唯一的出路？有沒有其它的可能性？至少，我們可以看到，第三世界地區爲了建立民族國家，沒有引發族群衝突而又有好下場的實在不多。國族主義不能逃避這些問題。這一波第三世界的國族主義已不同於以往對抗帝國主義的主軸，而在統一內部，抹殺異己，因此其主要目標是對「內」而非對「外」。

第四，國族主義自我中心、本位主義的世界觀，凡事以自己的利益爲利益，從自身的觀點看世界，無法發展出互利互惠的對話辯證（dialogic）模式，造成自戀的防衛機制，以及弱肉強食的邏輯。法農就曾經悲痛的批判第三世界在去殖民過程中不斷重演的悲劇：「從國族主義，我們已經過渡到超級國族主義，到沙文主義，最後到種族歧視（racism）」（Fanon, 1968：156）。更可悲的是，霍布森（J.A.

64. 西方有關國族主義、民族國家與現代化的討論，參見 Anderson (1991), Breuilly (1985), Gellner (1983), Hobsbawm (1990), Hobsbawm and Ranger (1983), Bulibar and Wallerstein (1991), Smith (1983), Bhabha (1990)。將民族國家與現代性聯結起來，最近的討論，參見 Tomlinson (1991：68—100)。論帝國主義的經典包括 Hobson (1965), Lenin (1939), Luxemburg (1976), Magdoff (1978)。

Hobson) 早在一九〇二年,就在名著《帝國主義》一書中早已指出國族主義極可能轉化成帝國主義：

正是真正國族主義的貶抑，企圖跨越自然岸界並想吸噬附近或是遠處領土上不願意也不可能被同化的人民，也就標示出國族主義已經一方面走向錯誤的殖民主義，另一方面走向帝國主義。(Hobson, 1965: 6)

從種族中心主義到國族主義，再升級至帝國主義，沒有本體論的必然性；但是如果沒有倫理學層次的介入，在情慾／慾望形構上徹底摧毀、轉化自戀的防衛系統，如果沒有去除國家中心導向的新國際主義立場，以對話形式將他者內化，形塑混雜 (hybrid) 的互為主體，是一種「成爲」(becoming) 的變動而非「存有」(being) 的堆積性邏輯過程，那麼個人主義、種族主義、國族主義、國家機器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之間的聯結，不僅是一串慾望的軌跡，也是歷史——邏輯上的結論。也就是在這樣的環結裡，以人民民主平行、對話結盟爲基礎的新國際在地主義，能夠解開僵局，在認識論層次打破被強加的國族國家界限，在方法論層次強調在地與國際的不斷辯證，在政治上反對一切霸權的運作，在倫理學層次內化他者，在慾望層次拆解「原始情感」(primordial sentiment) 的迷思及其建構性，成爲外在於國族主義—帝國主義的另類可能性⁶⁵。在這個立場下，國族主義是在地與國際辯證中的一個中介性 (mediation) 過程，而不再是統合性原則，民族解放運動只是多重社會抗爭的一條線，有其存在的正當性而沒有本體或是本質上的優先性。解構後重構的國族主義將無法再輕易地被權力統治集團收編，也才能成爲被尊重的解放力量。

誠如模里絲 (Menghan Morris) 所言，“我是國際主義者，因爲我是女性主義者”。對於女性、工人、原住民、同性戀等主體位置而言，只有打破國族界限，使自己與他者交互結盟才能彼此壯大。在這個策

65. 詳見陳光興 (1992), Chen (1992及 forthcoming)。

略的層次上，第一、二、三世界是沒有界限的，有資源的地區提供了在地作戰的武器，婦女新知愛滋防治手冊《愛要怎麼作？》的出版就是結合美國愛滋論述健將派頓（Cindy Patten）等人的研究與台灣現狀相互扣聯，對官方及普遍性的性恐慌及同性戀恐懼症（homophobia）的當頭棒喝⁶⁶。類似的「非國家中心主義」的跨界線連接，也發生在原住民、勞工等社會運動中。

此種不為國族主義、國族疆界的卡著的歷史實踐，可以稱之為「破國族」（Post-nation）⁶⁷的邊緣文化想像。「破」的意義在於1）破除國族想像的僵硬線條，2）打破國族必然性的迷思，3）國族之後的想像空間是一群「破爛」的國族，由被壓抑的社會主體所建構出一個個顛覆掉既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國族—國家，之後的跨疆界社會國族，如同志國（Queer Nation）在一九九〇年於紐約獨立建國，為同性戀連線打下基礎（Cruikshank, 1992）；其他的可能性如工人國、女人國、原住民國、蘭嶼國、汐止國、高雄國……這些「破國」都不以國家機器的搶奪為依歸所以不是國族主義，誠如克麗絲多娃（Julia Kristeva）所言，這些是「沒有國族主義的國」（nation without nationalism）（Kristeva, 1993）。也只有在這些破國之間穿插串連的接合政治（articulation politics）過程中，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父權體制、異性戀體制、種族沙文主義，才可能被徹底推翻。這裡要強調的是破國族的運轉與建構並不奠基在國家機器的取得，但是也不是無政府主義：破國族承認國家（State）存在的事實，也承認為其對社會形構的結構性影響力，但是企圖在國家機器商業體制之「外」發展自主性力量，以「既聯合又鬥爭」的方式與體制玩遊戲。因此破國族沒有「國家潔癖症」，但是認清自身是人民民主策略的延伸，在「體制」的外圍自我再生產，不依附體制，才能破除國家的負面依賴。

66. 感謝婦女新知愛滋工作小組負責人，倪家珍提供資訊

67. 此名詞是與丘延亮與吳永毅共同討論出來的。

4.4 「回到」第三世界

如果台灣次帝國主義的南進論述，有任何的正面意義，就在於刺激在地的反霸權批判性論述，繼續深化對第三世界結構性位置的認識。

從殖民—去殖民—再殖民／新殖民的理論軸線來看，我們發現台灣次帝國得以形成的意識形態基礎在於，去殖民的全面性反思根本沒有運轉，才會承續帝國主義的文化想像。台灣之外的次帝國（新加坡、韓國、香港）是否發生類似的狀況，是要繼續追問的問題，特別是文化—意識形態機器運轉的在地機制。在比台灣更有條件成為次帝國的南韓，已有學者開始以「亞帝國」的概念來思考南韓是否在複製帝國主義的擴張形式。香港的位置尤其特殊（台灣在一定的意義下相類似），處於傳統殖民地的狀態中，在地資本也能向外擴張，成為新殖民主；以商業形式為基礎，成為東亞地區重要文化工業的大工廠（電影、音樂、電視衛星），可能是歷史上少有的現象，它背後的理論意義到底何在？至少，去殖民的反思工作是文化研究的方向。

歷史的重寫、地圖的重劃是建構第三世界國族主義想像的重要策略（Anderson, 1991: 163—185），但是第三世界的批判性論述（包括文化研究）無需從國族—國家機器的平行位置來重寫歷史、重劃地圖，從階級、性別、少數民族、同性戀的破國家主體位置一樣可以聯結出第三世界的共通經驗，展現不同的歷史，畫出不同的地圖。ARENA, PP21 (People Plan for 21th Century) 組織性的實踐，確實證明了國族界限的虛偽性，證明了國族—國家並非第三世界被壓抑主體相互溝通時必須經過的中介。

最後，我要說，處於第三世界的文化研究不需要仿照傳統「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模態，企圖建立「巨型」具有通則性的理論架構，而想要放諸四海皆準，走進完全抽象化、概念化的想像世界；相對來說，從現實的、讓人困擾的現象、問題出發，透過分析、理論詮釋來介入現實世界，所構築出來的論述，可能會更具有知識實踐的解放力。這

是第三世界文化研究的政治認識論。

介入性分析是我們的武器，情慾的自省、解剖後的解放是我們的基地。

參考書目

- Ang, Ien, 1992, 〈不會說中國話—論散居族裔之身份與後現代之種族性〉, 《中外文學》21(7), 48—69 (施以明譯)。
- 丘亞飛, 1993, 〈國族意構情結的「返祖性」及其認知構陷〉, 《島嶼邊緣》2(4), 68—79。
- 王甫昌, 1992, 〈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經驗與理論的探討〉, 《省籍、族群與國家認同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 國策中心。
- 王振寰, 1993, 〈台灣新政商關係的形成與政治轉型〉, 《台灣社會研究》, 14期, 123-63。
- 王振寰, 1994, 〈李登輝下南洋—官資聯手的新民族主義來了〉, 《台灣工運》, 5, 70-2。
- 《日本文摘》, 1994, 〈太陽旗下的台灣〉, 五月一日。
- 《立法院公報》, 1994, 第二屆第三會期, 18。
- 《中國時報》, 1994, 〈來自南方的黑潮：南向專輯〉, 三月二至四日, 39版〈人間副刊〉。
- 《台灣評論》, 1992, 〈邁向獨立建國新階段〉, 創刊號。
- 史明, 1980, 《台灣人四年史》, 蓬島文化公司。(二冊)
- 史新義, 1988, 〈我們都是台灣民族兒女：台灣民族與台灣民族主義〉(上), 《台灣新文化》16, 69-91。
- 邱貴芬, 1992, 〈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 比較文學會議。
- 夷將·拔路兒與拉娃告·賴歌拉克, 1992, 〈台灣原住民族的發展史〉, 《獵人文化》16, 30-41。
- 李幼新, 1993, 《男同性戀電影……》, 台北：志文。
- 李光真, 1994, 〈批判論述的尖兵—楊照專訪〉, 《光華》2月。

- 林華洲，1992，〈歷史上的原住民〉，《獵人文化》16，42-9。
- 吳三連等，1971，《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
- 吳永毅，1994，〈一字之差的本土派和本土左派—《台胞》首映座談會的善意與敵意〉，《島嶼邊緣》9，100-6。
- 吳密察，1991，《台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鄉。
- 吳密察，張炎憲，1993，《建立台灣的國民國家》，台北：前衛。
- 施敏輝編，1988，《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台灣結與中國結的總決算》，台北：前衛。
- 晏山農，1994，〈高崖練劍的少年俠客—淺談《異議筆記》〉，《光華》，2月號，86-8。
- 莫那能，1989，《美麗的稻穗》，台中：晨星。
- 《島嶼邊緣》，1993，〈假台灣人〉專輯，8。
- 《島嶼邊緣》，1994，〈女人國、家（假）認同〉，9。
- 徐宗懋，1994，〈用「南向熱」孵化玫瑰園？反省國內「南向政策」的對話生態〉，《中時晚報》。
- 黃毓麟，1994，〈南向，究竟為那樁〉，《中國時報》，3月31日，9版。
- 曹永和，1994，《台灣早期歷史研究》，聯經（第四版）。
- 陳光興，1988，〈「花園裡的癩蝦蟆」〉，《當代》，4月號。
- 陳光興，1992，《媒體／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逃逸路線》，台北：唐山。
- 陳光興，1994，〈解毒《文化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約翰，湯姆林森著，馮建三譯，時報出版公司出版。
- 陳芳明，1990，《台灣內部民主的觀察》，台北：自立。
- 陳傅興，1994，〈種族論述與階級書寫〉，〈40~90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論，《中國時報》，1月。
- 黃美英，1993，〈變動的國界和族界〉，《自立早報》，八月二日。
- 張炎憲，1994，〈五十年政治血淚〉，《日本文摘》，100，16-40。
- 張茂桂，1992，〈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問題與反省〉，《省籍——族群與國家認同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策中心，頁6-1-6-21。
- 張娟芬，1994，〈許信良將出書談「新興民族」〉，《中國時報》，3月31日。

- 《愛福好自在報》，1994，2：同志國。
- 楊照，1993a，〈臨界點上的思索〉，台北：自立晚報。
- 楊照，1993b，〈往事追憶錄〉，《聯合文學》101，54-102
- 楊碧川，1988，《日據時代台灣人反抗史》，台北：稻鄉。
- 趙剛，1994，《小心國家族：批判的社運及社運的批判》，台北：唐山。
- 機器戰警，1991，《台灣的新反對運動—新民主之路：「邊緣癡覆中心」的戰鬥與遊戲》，台北：唐山。
- 戴國輝，許信良，1994，〈後悲情時代的預告〉，《中國時報》，6月8-9日，39版。
- 譚石，1994，〈不該缺席的文評家〉，《中國時報》，〈開卷〉，3月31日。
- 顧秀賢，1993，〈楊照，文化批判和他的敵人〉，序《臨界點上的思索》，1-5。
- Ahmad, Aijaz. 1992.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 London: Verso.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Arendt, Hannah. 1973.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Balibar, Etienne and Wallerstein, Immanuel (1991).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London: Verso.
- Bhabah, Homi K. 1990.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 Bhabha, Homi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Barlow, Tani. 1993. Colonialism's Career in Postwar China Studies, *Positions: East Asian Culture Critique* 1 (1): 224-67.
- Blaut, James M. 1987. *The National Question: Decolonising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London: Zed Books.
- Bourdieu, Pierre. 1987. 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2:1-18
- Breuilly, John. 1985.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 Chicago Press.
- Chen, Kuan-Hsing. 1992. Voices from the Outside: 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ist Localism, *Cultural Studies* 6 (3).
- Chen, Kuan-Hsing (forthcoming). Yellow Skin, White Masks? 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ist Localism, in K.H. Chen (Ed.), *Trajectories: 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ist Cultural Stud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hen, Kuan-Hsing (forthcoming), Not yet the *Postcolonial Post-Colonial* Era: the (Super) Nation—State and Transnationalism of cultural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
- Chiu, Fred Y.L. 1994. Some Observations on Social Discourse Regarding Taiwan's 'Primordial Inhabitan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Clairmonte, Frederick. 198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national Power, in Peter Limquenco (Ed.), *Partisan Scholarship*, Manil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Publishers, 320-43.
- Constantino, Renato. 1988. *Nationalism and Liberation*,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Karrel, Inc.
- Constantino, Renato. 1990. *The Philippines: The Continuing Past*,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The Foundation for Nationalist Studies. (5th printing) .
- Constantino, Renato. 1991. *The Making of a Filipino: A Story of a Philippine Colonial Politics*,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Malaya Books. (7th printing)
- Constantino, Renato. 1992. *The Philippines: A Past Revisited (Pre-Spanish-1941)* (13th printing), Quezon City: The Foundation for Nationalist Studies.
- Curikshank, Margrette, 1992. *The Gay and Lesbian Liberation Movement*, New York: Routledge.
- David, Kumar and Kadirgamar, Santasilan (eds.). 1989. , *Ethni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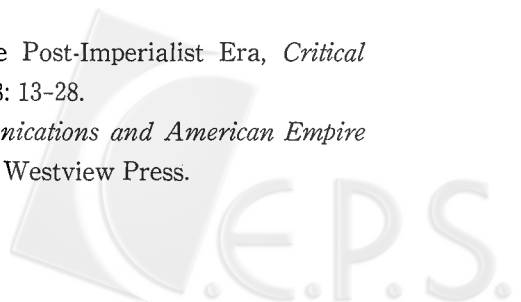
- Identity, Conflict, Crisis*, Hong Kong: ARENA Press.
- Dirlik, Arif. 1994.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Critical Inquiry* 20: 328-56.
- Duras, Marguerite. 1986. *The Lover* (trans. by Barbara Bray), New York: Perennial Library, Harper and Row.
- During, Simon (Ed.). 1993.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Encarnacion, Teresa, and Tadem, Eduardo. 1989. Ethnic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paratist Movements in Southeast Asia, in Kumar David and Santasilan Kadirgamar (eds.), *Ethnicity: Identity, Conflict, Crisis*, Hong Kong: ARENA Press, 70-94.
- Falk, Richard. 1992. Democratizing, Internationalizing, and Globalizing: a Collage of Blurred Images, *Third World Quarterly* 13(4) : 627-40
- Fanon, Frantz. 1968.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 Fanon, Frantz. 1967.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 Foucault, Michel. 1973.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antage Books.
-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U. Press.
- Gilroy, Paul. 1987. '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Race and 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mez-Pena, Guillermo. 1992-3. The New World (B)order, *Third Text* 21:71-9.
- Grossberg, Lawrence, Nelson, Cary, and Treichler, Paula (eds.). 1992.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 Guha, Ranajit and Spivak, Gayatri. 1988. (Ed.),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 Stuart. 1980. Popular Democracy vs. Authoritarian Populism:

- Two Ways of 'Taking Democracy Seriously', in A. Hunt (Ed.), *Marx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57-85.
- Hall, Stuart. 1991.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Globalization and Ethnicity, and Old and New Identities, Old and New Ethnicities, in Anthony D. King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 Hall, Stuart. 1992.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S. Hall, D. Held, T. McGrew (ed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Polity Press, 274-316.
- Hall, Stuart. 1995.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London: Routledge.
- Hartsock, Nancy. 1983. *Money, Sex and Power: Toward a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Hechter, Michael. 1975.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eng, Geraldine, and Devan, Janadas. 1992. State Fatherhoo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Sexuality and Race in Singapore, in Andrew Parker et al. 1992. *Nationalisms and Sexu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343-64.
- Hobsbaum, E.J.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bsbaum, E.J. and Ranger, T. 1983.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 Press.
- Hobson, J.A. 1965. *Imperial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2)
- Hofstadter, Richard. 1965.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New York: Braziller.
- Ibrahim, Zawawi. 1989. Ethnicity in Malaysia, in Kumar David and

- Santasilan Kadirgamar (eds.), *Ethnicity: Identity, Conflict, Crisis*, Hong Kong: ARENA Press, 126-42.
- Ileto, Reynaldo Clemena. 1989. *Pasyon and Revolution: Popular Movements in the Philippines, 1840-1910*,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Third Edition)
- Jones, Greta. 1980. *Social Darwinism and English Though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iological and Social Theory*, Sussex: the Harvester Press.
- Johnson, Marshall. 1990. *Classification, Markets and the State: Constructing the Ethnic Division of Labor on Taiwan*, Ph. 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 Kristeva, Julia. 1993. *Nation without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 Laclau, Ernesto. 1977.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Verso.
- Laclau, Ernesto, and Mouffe, Chantal.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 Verso.
- Lee Geok Boi. 1992. *Syonan: Singapore under the Japanese (1942-45)*, Singapore: Singapore Heritage Society.
- Lenin, V.I. 1939. *Imperialism in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 Luxemburg, Rosa. 1976. *the National Question: Selected Writings of Rosa Luxemburg*,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Magdoff, Harry. 1978. *Imperialism: From the Colonial Ag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Mattelart, Armand. 1983. *Transnationals and the Third World: The Struggle for Culture*, Massachusetts: 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
- Miyoshi, Masao, A Borderless World? From Colonialism to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State, *Critical Inquiry*

19: 726-51.

- Morley, David. 1995. Postmodern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 London: Routledge.
- Nandy, Ashis. 1983.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the Self*,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hadnis, Urmila. 1990.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 Asia*, New Delhi: Sage.
- Pletsch, Carl E. 1981. The Three Worlds, or the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tific Labor, circa 1950-1975,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 (4): 565-96.
- Pratt, Mary. 1992.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Public Culture. 1993. Controversies: Debating in Theory, 6 (1).
- Robins, Kevin. 1991. Tradition and Translation: National Culture in its Global Context, in John Corner and Sylvia Harvey (eds.), *Enterprise and Heritage: Crosscurrents of Nation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Said, Edward.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Said, Edward.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Sakai, Naoki, 1994.; Subject and/or Shutai and Inscrip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examining Cultural Imaginary of Modernity symposium,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 Schiller, Herbert. 1991. Not yet the Post-Imperialist Er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8: 13-28.
- Schiller, Herbert. 1992.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2nd Edi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Sedgwick Eve. 1985.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Anthony D. (1983.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 Social Text, Post-Colonialism, 31/32, 1992.
- Soja, Edward.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y: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 Spivak, Gayatri. 1990.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New York: Routledge.
- Sundaram, Jomo Kwame. 1989. Nationalist Alternative for Malaysia? in Peter Limquenco (Ed.), *Partisan Scholarship*, Manil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Publishers, 213-32.
- Suryadinata, Leo. 1975. *Primubi Indonesians, the Chinese Minority and China*, Kuala Lumpur: Heinemann.
- Tan, Gerald. 1993. The Next NICs of As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14(1): 57-73.
- Tomlinson, John. 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ittig, Monique. 1992. *The Straight Mind and Other Essays*, Boston: Beacon Press.

後記

本文初稿於一九九四年四月底完成。幾乎在同時，「千島湖事件」的發生，再次引爆台灣民族國的熱潮，後因中共官方出面致歉而熄滅了一場熱火。五月初，李登輝率軍東進中美洲，以幫助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等國經濟建設來交換支持他的建國大業——要求各國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更具戲劇效果的是其南非之行，慶賀曼德拉「和諧建國」，是改革的「天才」（《中國時報》1994、5、21，二版，李登輝語），充份展現其認同慾望之所在；並透過這個場合與非洲無邦交國尚比

亞、多哥、喀麥隆商討建交事誼，企圖經由轉戰國際社會之承認，達成「軟性獨立」之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李登輝在五月初於日本報紙接受訪問，後由台灣報紙轉載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一文，文中李氏說「這之前為止掌握台灣權力的，全都是外來政權」，包括國民黨在內⁶⁸，顯示出他已有信心地完成了一場寧靜革命，使中國國民黨成為台灣國民黨，首次為「我族」所統治；其間的感性語言再次深化國家機器對於台灣國族主義的收編。這篇文字「不過是說出了台灣人真正的感受」（媒體用語），值得仔細的分析，來理解統治者如何捕捉「台灣人意識」的心理構造，轉化成他威權式民粹主義的利器。

「台灣人」確實可悲，數百年的反殖民能量如此輕易的為統治集團所收編，這個新的政治狀況，新的意識形態慾望形構，必需被正視、積極面對，否則新保守主義將持續籠罩著台灣的上空。

本文的書寫在此暫時告一段落，歷史的不斷變動使得分析性論述永無終止。可以預見的是傳統的主流意識形態立場—統、獨、統左、獨左—又將繼續使用他們自戀式的標籤來框架本文的立場：獨派說這篇文章其實是新統派，統派說這種立場西化獨派，兩派的共識會是血源論—「外省第二代」的新黨政治立場。這些漢人福老男性沙文主義的防衛性機制，與其說是企圖瞭解本文的政治立場，不如說是他們自我自戀的投射。如果說從血源論來貼標籤，我也只能說，「外省第二代」立足權力集團之外的反對運動主體位置，或許能分析出福老男性沙文主義的集體潛意識。不以獨立建國為依歸，不以國家機器之間的統一為目標，外在於主流意識形態空間的發言位置，就不會有國家機器中心主義的慾望，也才能看清局勢的運轉邏輯。

要我自己標定論述立場，我會說這是我一貫「新國際主義在地主義本土左派」的論述位置，主張非國家機器中心（non-statist）的人民民主理念，支持各種反宰制、反霸權社會運動自主性的建立；立足台灣在地抗爭，與第三世界及國際非權力集團的主體群，不斷辯證結盟、在認識中相互改變的立場。任何回應文字如果僅以貼標籤、宣揚統獨大業的方式，而不根據文章內容相當的理論層次來操作，本人將不與理會。

本文的一部份曾於1994年5月清大亞太文化研究室主辦的“文化想像與現代性”研討會中宣讀，日裔學者 Naoki Sakai (1994)在會中發表的論文討論日帝

1920, 30年代的論述建構，其結論幾乎與本文一致。Sakai 在對話中提供相當有趣的資訊與論點，揭穿了本土派學者引用日本右翼學者近來企圖對日帝殖民翻案的共謀行爲。在此特別感謝他。

68. 見〈生爲台灣人的悲哀：李總統與日本司馬遼太郎對談〉，《自立晚報》，1994.4.30—5.2

